

一位最早在肇慶傳播西方文化的人

蕭健玲*

北京在2000年新世紀到來時修建了史無前例的“中華世紀壇”，在其金碧輝煌的環形世紀廳中，把對中華文明作出突出貢獻的歷史名人用浮雕一一展現。在一百多位名人中，有兩位外國人，一位是沿着陸上絲綢之路來到東方、把中國文化帶到西方的馬可·波羅；另一位就是從海上來到中國、帶來了西方科學和技術的利瑪竇。在這命名為“中華千秋頌”的大型浮雕圖中，對利瑪竇的評價是這樣的：“利瑪竇（1552-1610），意大利傳教士，他在中國二十八年，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瞭解中國風土人情，結識當時的文人、學者，並修建了禮拜堂，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貢獻。（坤輿萬國全圖）為一幅世界地圖，由他繪於肇慶，1602年刊行於北京。”

利瑪竇是一位最早在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的意大利人。他於1583年9月10日從澳門抵達廣東肇慶，從肇慶開始了他在中國內陸的文化之旅。利瑪竇在肇慶知府王泮等人的支持下，在肇慶建起了中國內陸第一座歐式風格的建築德花寺；繪製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讓國人從地圖上直觀地看到了世界的縮影，開闊了視野；研製出中國第一座機械自鳴鐘，使中國人學到了西方機械自鳴鐘的製作技術；合編了第一部《葡漢辭典》，使國人與外國人交流有了一本語言翻譯工具書，為漢字拼音開闢了新路；傳播了西方的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使當時國人認識西方文明、學習西方的先進科技；展出了西方國家的一些科技書籍，讓國人從書中見識了西方的造紙和印刷術。利瑪竇在肇慶居留六年，後輾轉於韶州、南昌、南京、北京，1610年在北京去世。

利瑪竇著譯有十九種之多，內容涵蓋哲學、科學、宗教、倫理等。他將中國的《四書》、《五經》等譯成拉丁文推向歐洲國家，為傳播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扮演了“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的雙重角色，被譽為“歐洲漢學之父”。所以，利瑪竇在華開啟的事業實際上並非首先是傳教而是擔當了文化大使這一非凡的角色。把利瑪竇列入中華世紀壇之“中華千秋頌”中，可見中國人對利瑪竇是十分敬重的。

攻讀不輟 博學有成

利瑪竇生於16世紀意大利東部馬爾凱省的瑪切拉塔城（Macerata）。⁽¹⁾這座城地處兩條河流之間，位於高山之巔，從城中可俯望遠處的亞得里亞海。該城在教宗的領地內，與羅馬有着密切的聯繫。城中有人口一萬三千人。

利瑪竇的父親若翰·利奇是瑪切拉塔城的市長。他原職業是藥劑師，在城中開有藥店，是個成功的商人。若翰·利奇熱衷於從政，不但擔任瑪切拉塔城的市長，而且還有一段時期任過馬爾凱省的代理省長。利瑪竇的母親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一位溫雅而又賢德的母親。她生育了九男、四女共十三個孩子。利瑪竇是長子，出生於1552年10月6日，

*蕭健玲，肇慶市博物館館長。



瑪切拉塔市（Macerata）位於意大利中部東邊，為意大利名城。（上）利瑪竇故鄉瑪切拉塔市一景；（下）利瑪竇故居（牆上紀念石匾 1983 年立）

名叫利奇·瑪竇（Matteo Ricci），Ricci 是他家族的姓。在意大利語中，Ricci 是一種海刺蝟，他家族的標誌就是在大紅底色上繪上一隻黑色刺蝟。

利瑪竇的父親公務繁忙，母親又要打理一大堆家務事，忙碌不堪。所以，利瑪竇從小就交由祖母代管。小瑪竇五歲那年，父母把他托到利奇公館對面一間規模很小的聖天主堂幼兒園，由彭里凡尼神父教其學習拉丁文。

在小瑪竇心目中，彭神父是他的偶像。他非常敬佩這位啟蒙老師。在彭神父的眼裡，小瑪竇是一個天資聰明勤奮好學的學生。小瑪竇在班上考試總是第一，彭神父對小瑪竇總是特別悉心教導。

1559 年 11 月 5 日，彭里凡尼神父進了依納爵神父創立的修會——耶穌會⁽²⁾。該會匯集了一群非常有學問的神父和修士，他們立志要把天主的福音傳播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彭里凡尼神父加入耶穌會，就離開了這間幼兒園。利瑪竇因而輟學在家，時年七歲。

1561 年，有十三位耶穌會士來到了瑪切拉塔城，在城外辦了一間小學校。利瑪竇成為這間小學校的首批學生。學校於 1565 年從城外遷到城內，利瑪竇在這間學校讀完小學，不但學習拉丁文，還學習希臘文。利瑪竇非常好學，得到師長們精心培育。他們把一套精心研究出來的記憶法傳授給他。利瑪竇就是按那稱為“記憶秘宮”的方法去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練就了過目不忘的本領。

利瑪竇十六歲中學畢業，父親為了利瑪竇將來能繼承利奇家族的勳銜⁽³⁾和市長職位，決意把他送往羅馬深造法律，以便日後順利步入仕途。他託羅馬城中的親友幫忙，為利瑪竇在日爾曼法學院報讀法律。

1568 年 10 月，利瑪竇告別故鄉，從瑪切拉塔山城走進了歐洲名城、天主教首府、國際大都市羅馬。在這個繁華的京城裡，有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⁴⁾創立的日爾曼公學、羅馬學院以及聖安德烈備修院。十六歲的利瑪竇抵羅馬，參加了日爾曼公學創立的聖母會（The Sodality of the Blessed Virgin），成為該會最早的成員，這是他邁向畢生從事宗教事業的第一步。

利瑪竇在日爾曼法學院攻讀了三年法律，接觸不少學識淵博、品德出眾的耶穌會修士，萌發了加入耶穌會的念頭。1571 年 8 月 15 日聖母昇天節那天，十九歲的利瑪竇鼓起勇氣為自己的前途作出決擇。他叩開聖安德烈備修院的門，找到

這間學院的負責人請求入會。學院導師范禮安接見了利瑪竇，同意他加入耶穌會。於是，利瑪竇違背了其父的意願，放棄了法學深造，拋棄了誘人的前程，轉入耶穌會主辦的聖安德烈備修院學習。

利瑪竇在聖安德烈備修院學習了一年零一個月，於1572年9月之後進入羅馬學院⁽⁵⁾繼續學習。羅馬學院學制完善、教學規範⁽⁶⁾，是當時歐洲好學青年神往的地方。利瑪竇在羅馬學院進修了兩年修辭學、三年哲學。在兩年的修辭學學習中，利瑪竇學會了怎樣把詞語和思想結合，用清晰的表現來磨練理解。他的記憶力驚人，不論甚麼書，祇要讀過一遍，就能一字不差地把每一頁都背誦出來。1575年，利瑪竇開始進入三年的哲學學習。在第一年裡，他學習數學；第二年，用四個月學習《歐幾里德幾何》前四卷、一個半月學習應用數學、兩個半月學習天文學、兩個月學習地理學，學年末剩餘時間學了《歐幾里德幾何》第五、六兩卷；第三年，用兩個月學習星盤、兩個月學習行星原理、三個月學習透視學，剩餘時間學習鐘錶製造和教會曆。利瑪竇在諸多學科的學習中成績拔尖。

利瑪竇很幸運，他得到兩位傑出人物任導師。一位是克拉委奧(Christophorus Clavius)⁽⁷⁾。他是一位造詣很高的著名數學家。在許多高級耶穌會士尚未認識到數學的重要性而阻止學生學習時，克拉委奧卻教學生學數學並向羅馬學院的青年耶穌會士說：“學生們瞭解數學，對正確理解其它哲理科學既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是最基本的事情。”他認為，天體星球的運動，相關物質之間的無止境分割，海水的潮漲與潮落等，都需用數學方法計算出來；所以，他主張學生要學好數學，把數學應用到其它學科的實踐中去。在克拉委奧的指導下，利瑪竇學習了歐幾里德幾何，而且掌握了研製天文儀器和鐘錶的技術，這為他日後到達中國在向中國人傳教的同時向中國人傳播西方文化打下了基礎。另一位導師是白拉明，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辯論家，學識淵博，三十四歲時已在歐洲享有盛名。1576年9月，他開設了“辯論課程”，利瑪竇每週兩次去聆聽他的精采演講。白拉明善於辭令的天才辯論，使



利瑪竇1552年10月6日出生於意大利東部瑪切拉塔市一個望族家庭，父親若翰·利奇是該市市長，利瑪竇從小學到中學都在耶穌會學校讀書，16歲中學畢業後父親送他到羅馬深造法律。



利瑪竇在羅馬攻讀法律的第三年，為自己的前途作了抉擇，於1571年8月15日加入耶穌會，轉入該會主辦的羅馬學院攻讀哲學和神學。



利瑪竇在羅馬學院學習期間，得到大數學家與天文學家克拉委奧指導，學會了地球儀、觀象儀、時鐘的製作，為日後在華傳教和傳播西方科學文化打下了良好基礎。



1578年3月24日利瑪竇登上了駛往東方的船，歷盡艱險，於9月13日抵達印度西岸的中心城市果阿（Goa）。利瑪竇在那裡生活了四年，完成了基督教神學課程，並先後兼任兩間修院的拉丁文教師。



1582年4月利瑪竇應耶穌會東方教務負責人范禮安之召於同年8月7日抵達澳門。



利瑪竇於澳門潛心學習漢語，努力瞭解中國風土人情、國家制度、政權組織和歷史文化，為進入中國內地做準備。

利瑪竇得益非淺。利瑪竇後來在中國傳教時善於辭令的交際才華，就是歸功於白拉明潛移默化的教導。

利瑪竇攻讀不輟，博學有成，特別是在數學這一門功課上表現得最為出色，被他的師長認定是很有希望的數學家。

離鄉別土 跋涉東來

利瑪竇在羅馬學院學習期間，在與大家的交談中，十分羨慕沙勿略的傳奇經歷。沙勿略在十年中徒步行走了十萬公里以上，足跡遍及印度、斯里蘭卡、馬來亞、新加坡、日本等地。他雖然立志要到中國未得成功而客死它鄉，沙勿略的精神深深感動了利瑪竇。利瑪竇盼望有一天能繼承沙勿略的遺願，踏足中國。1573年9月，他的師長范禮安⁽⁸⁾被耶穌會總會長任命為修道會長，委以東印度全體耶穌會士巡察使⁽⁹⁾，奉命赴亞洲傳教區。這令利瑪竇羨慕不已，他立志畢業後一定要像范禮安師長那樣，申請到遙遠的亞洲去做一名傳教士。為此當利瑪竇在羅馬學院剛畢業，就多次向修會提出申請，希望派他到外國去傳教。

1576年底，耶穌會駐印度財務主任回羅馬述職並要挑選一些教士赴印度傳教。利瑪竇抓住這個機會，馬上遞上申請書，懇切要求赴亞洲傳教。他的申請終於獲得批准，1577年春，耶穌會總會長正式派利瑪竇赴印度傳教。

利瑪竇等人覲見了教皇額我略十三世後，先到里斯本學習一年葡萄牙語。1578年3月24日，利瑪竇一行十四名傳教士分別登上從葡萄牙駛往東方的航船。利瑪竇乘的是聖路易斯（Saint Louis）號帆船，同船的傳教士還有米歇爾·普吉里（Michele Ruggieri），他是意大利南部人，三十五歲，那不勒斯大學法學博士。他是利瑪竇後來在中國的拍檔，在中國的名字叫羅明堅。

從里斯本到果阿，路經大西洋、印度洋，遙遙幾萬里，在海上航行起碼需要半年以上。聖劉易斯號是一艘笨重的中世紀帆船，載重約九百噸，船艙高僅三尺，寬一丈，人在船艙中祇能坐臥不能直

立。船艙裡裝滿了毛織品、布料、水晶、玻璃、時鐘和葡萄酒等貨物。船上乘客大約五百人，人貨混雜，其間艱難困苦難以言狀。當船隊向南航行了一個月駛入赤道區時，烈日當頭，狹窄而擁擠的船艙熱氣蒸騰，令很多乘客中暑患病。

1578年6月，船隊沿非洲南端好望角海岸航行到達莫桑比克島拋錨補充食物和食水。島上涼風習習，乘客紛紛湧上達摩比克島，享受久違的清涼空氣。大家在島上逗留了兩個月，病者得到了有效的調理。

船隊於8月繼續起程，沿着阿比西尼亞山區的海岸向北折向東橫渡印度洋，於9月13日抵達印度西岸的中心城市果阿。

與羅明堅、利瑪竇一齊登岸的還有乘另一艘帆船的意大利傳教士阿卡維伐和巴範濟。四位年輕的修士經過六個月海上航程，雖然疲乏不堪，但當他們一踏上陸地，心情立即興奮起來。四人躺在棕櫚樹下暢談未來。

他們都知道，果阿不是他們傳教的終點站，它僅是耶穌會在遠東的大本營，一個派遣傳教士到印度其它地方及日本等國的基地。羅明堅是四人中年齡最大的，他向大家預言：將來他們四人定會在一起工作，而他就做律師，阿卡維伐做神學家，巴範濟做哲學家，利瑪竇做數學家。

利瑪竇聽了就笑着問會被派到哪個國家去？羅明堅回答說要到中國去，講完就哈哈大笑起來。因為他清楚，中國是禁止外國傳教士進入的，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位西方傳教士曾經進入過中國內地。阿卡維伐在旁卻一本正經叫羅明堅別再笑了，可能將來的情形真的如此。利瑪竇聽後也很有信心地附和：說不定將來突然會出現奇蹟，大家一同踏上中國國土，一齊在那裡工作。

最令這四位年輕修士興奮的話題是如何進入中國，這不僅是因為傳說中的中國非常有魅力，更重要的是，他們所崇拜的前輩沙勿略儘管為進入中國內地做了種種努力，卻仍未能成功，這對他們的挑戰性非常強。四位年輕人在果阿城外談論未來，互抒懷抱，之後攜帶行李進入果阿城。

耶穌會遠東傳教團視察員范禮安自從到澳門後，就不斷為叩開中國內陸的大門而努力。他細心研究了以往失敗的原因，感到用“葡萄牙化”的方法不利於在中國傳教，對以往的傳教方法做了很大的修改。他提出，到中國傳教應採取特別的方式，不明說是傳教，而說是為羨慕中國文化而來。他要求到中國的傳教士要精通中國語文，瞭解中國的風俗人情，以便與中國人溝通。范禮安在這四名年輕修士中選中了成熟的羅明堅到澳門做他的助手，把學習中文，瞭解中國文化，研究中國風俗和法律的任務交給羅明堅，為進入中國內陸傳教做準備。

羅明堅離開印度赴澳門後，阿卡維伐在年底也被派往亞格伯皇廷擔當耶穌會使團負責人。利瑪竇被安排在當地聖保祿學院繼續完成神學課程。利瑪竇在果阿讀了一年神學後，便一面繼續研修神學，一面去教高班學生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

1579年11月，利瑪竇因水土不服患上重病，被送到離果阿城六百多公里外的交趾養病。經過半年的調理治療，病情慢慢好轉，1580年7月25日在印度柯枝(Cochin)晉陞司鐸；之後，又回到了果阿繼續研修神學。其間，利瑪竇經常到輔理修土工場學習鐘錶、機械或印刷工藝，在不知不覺間為日後入華的傳教事業做好充份的準備，憑着他豐富的科學知識和精巧的手工藝，日後入華可以駕輕就熟地製作時鐘等稀奇珍貴的禮物饋贈給中國的官員和士大夫。

此時，羅明堅在澳門學習中文碰到很大困難，他想到了記憶力驚人的利瑪竇，便請示范禮安召利瑪竇到澳門來一齊學習中文。范禮安批准了此項請求。於是，在印度果阿停滯四年之久的利瑪竇奉召抵澳門，與他一同赴澳門的還有巴範濟。

1582年4月26日，利瑪竇乘船離開果阿。在船駛入赤道馬六甲港口向中國海揚帆的這段海程時，他由於受不住酷熱折磨患了重病，這病延續了五個星期，一直到航行到氣候溫和的澳門港時，才得以好轉。

羅明堅的笑言以及阿卡維伐的預言眼看就要變為現實了，這使利瑪竇興奮不已。

一波三折 終抵肇慶

1582年8月7日(明萬曆十年),三十歲的利瑪竇踏上了中國澳門。⁽¹⁰⁾

澳門半島位於珠江和西江三角洲的南端,地處熱帶,氣候屬亞熱帶,原始面積2.78平方公里,原是個屹立於海中的小島,後因西江上游帶來的泥沙沖積而成一道南北方向的沙堤,使該島成為與大陸一徑相連的陸連島。利瑪竇在澳門的聖萬迪諾新信徒學校學習了一年中文,其間除潛心學習漢語外,還積極瞭解中國的政治、歷史、法律、風俗等,為進入中國內地做準備。

1582年12月18日,羅明堅與巴範濟奉命前往肇慶。

肇慶位於廣東中西部,珠江主幹流西江、北江穿境而過,地處北緯20°46'C-24°24'C,東經111°21'C-112°51'C,北回歸線橫貫其中,屬亞熱帶季風性氣候,全年陽光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常青。城區南臨西江、北倚北嶺,中部為河谷沖積平原,東西兩端重巒疊嶂緊鎖江流,形成三榕峽、大鼎峽、羚羊峽。境內山丘臺地疏落散布,石山聳立,湖泊密布,構成獨特自然景觀。此地於公元前111年(漢元鼎六年)設立高要縣,公元589年(隋開皇九年)廢高要郡置端州,公元1118年(宋重和元年)改為肇慶府。由於當時肇慶是兩廣總督府駐地,羅明堅他們要想進入中國內地,須從駐肇慶的兩廣總督入手。羅明堅赴肇慶前,把聖萬迪諾新信徒學校的事務託利瑪竇代管。利瑪竇在管理該校事務的同時,埋頭伏案刻苦學習中文,他的中文水平很快得到提高。他高興地寫信給耶穌會總會長彙報:“對於中國話,我已稍有成就。”

羅明堅、巴範濟於1582年12月27日抵達肇慶城。在這之前,羅明堅曾於1582年春隨澳門主教薩來約和葡萄牙長官滿多薩為解釋葡萄牙人在澳門行使統治權的法律基礎問題⁽¹¹⁾到過肇慶拜會兩廣總督陳瑞⁽¹²⁾。羅明堅此行給陳瑞留下了特別好的印象,他抓住機會,向陳總督提出在內地設立居留地的請

求。陳瑞承諾待羅明堅下次抵肇慶時再議。所以,羅明堅這次便以送代購物品與訪問為由重來肇慶。“他們獻上錶和幾隻三角形的玻璃鏡,鏡中的物品映出漂亮的五顏六色。在中國人看來,這是新鮮玩意兒,長期以來他們認為玻璃是一種極為貴重的寶石。令人驚異的是看到禮物多麼地討總督大人的喜歡,他又多麼殷勤地接待來賓。他又派給他們一座寬敞的住所,與郊外的一座叫作天寧寺(Thien-nin Su)的廟宇相通,他還時時送去食物和其它東西。”⁽¹³⁾

西方傳教士終於第一次獲得了在中國內地城市肇慶暫時居留的機會。羅明堅與陳瑞建立了友好關係,他與巴範濟去拜會陳瑞時,陳瑞在官邸裡接見了他們。“他們就是這樣住了四、五個月,接待一些官員和其他知名公民的來訪,同時他們抱着希望,這種特許將會成為永久性的許可。”⁽¹⁴⁾1583年1月,羅明堅向陳總督手下一位侍衛官提出,想搬出這所房子,自建一所房屋居住。這位官員告訴羅明堅,如果他們願意換上中國的服裝,變成中國天子的子民,他們這個請求就有可能會實現。羅明堅聽後大喜,馬上呈書陳瑞,陳述他們仰慕天朝,想與肇慶的百姓共同生活,如蒙總督批准,他們可與本國脫離關係,甘願作為中國皇帝的子民。羅明堅等人在肇慶的各項工作似乎很順利,兩廣總督陳瑞不但“准許他們在那裡居住,並提供食宿”;而且,當“神父們聲明願作中國皇帝的順民時”,陳總督便認為“應該更換衣服”,“於是他把北京和尚的服裝賜給他們,這是他所能恩賜的最體面的服飾了。”⁽¹⁵⁾此外,“他們已得到總督秘書的允許,把利瑪竇神父請來,而他也正在澳門的學院中準備這次旅行。這時事情突然變了樣,茂盛的希望消逝了。”⁽¹⁶⁾

羅明堅在肇慶暫時居留祇持續了幾個月。1583年的3-4月間,宰相張居正案發,陳瑞被控是同黨受到牽連而被解職。陳瑞怕有人告發他批准外國人入住肇慶會加重處治,所以他在解職北上前,令羅明堅和巴範濟迅速離開肇慶。羅明堅祈盼在肇慶長期居留並建立耶穌會會所的期望因此而落空;但他不甘心就此功虧一簣,懇求陳瑞想法另地安置他們。

於是，陳瑞“發給他們證書，允許他們去該省的省城，並指令那裡的主管官員供給他們一所房屋和一塊修建教堂的地皮”⁽¹⁷⁾。陳瑞要羅明堅把這封公函給廣州分巡海道副使朱東光，讓朱東光關照羅明堅在廣州居住。

然而，這位被罷了官的官員的“證書”沒有一點作用。羅明堅和巴範濟乘船到廣州後，江防守衛推說海道副使朱東光不在，說甚麼也不准他們上岸。羅明堅和巴範濟⁽¹⁸⁾祇好返回澳門。

繼任兩廣總督姓郭名應聘，原是廣西巡撫，為官清正，操守簡樸，是一位頗有口碑之人，故經考核後得以陞遷。郭應聘到任後，他在前任移交的公文檔案中發現了一份簽發給神父們的“證書”副本，就飭令分巡海道朱東光和香山知縣馮生虞查辦此事。

香山知縣馮生虞接此令後，由於他對整件事一無所知，所以去函讓澳門港衛隊幫助調查此事。澳門港衛隊馬上派出特使找到羅明堅查詢。當特使從羅明堅那裡看到前總督給他的那份“證書”有正式簽押和官印時，便聲稱前總督在罷官後簽發的“證書”無效，這份“證書”不能再保留在他們那裡，要神父交回。羅明堅鑒於范禮安不在澳門，便找到在澳門的卡耐羅（Melchior Carneiro）大主教，卡普萊勒（Francisco Cabral）和戈麥茲（Pedro Gómez）神父等人商議，一致意見是不能就這樣把這份“證書”交給澳門港衛隊的來使，而應派兩名神父將“證書”送到廣州找朱東光，“要求他按所寫的那樣把它們付諸實施”⁽¹⁹⁾。澳門港衛隊的使者認為很難再勸服神父們交出“證書”，就應允神父們赴香山縣，並答應讓香山知縣馮生虞把他們送往省城找朱東光裁定。

羅明堅和利瑪竇被選派去擔任這項具有挑戰性的使命，兩人攜着前總督陳瑞發給他們的“證書”齊赴香山縣。

香山知縣馮生虞在縣衙接見羅明堅和利瑪竇，要求他們交出“證書”向總督回稟結案。羅明堅與利瑪竇懇求馮知縣允許他們把“證書”送到廣州面呈海道副使朱東光。馮生虞說甚麼也不同意，他堅持要羅明堅先交“證書”才再考慮送他們到廣州。羅明堅

和利瑪竇拒絕了這個要求，馮生虞大發雷霆，“他喊道：‘你們想用一封罷官總督簽署的文件來辦事嗎？’接着他拒絕讓他們去省城，命令他們回澳門。”⁽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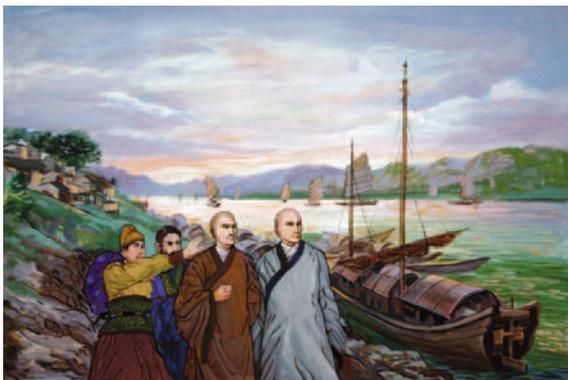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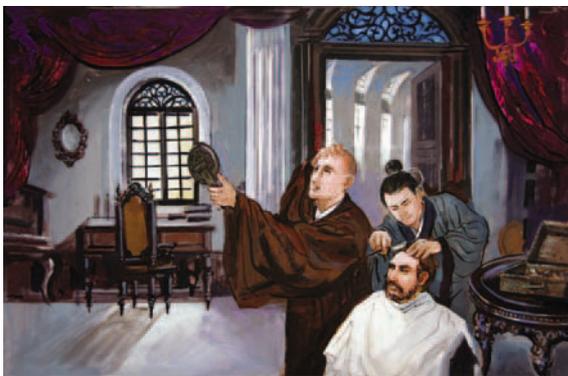
羅明堅、利瑪竇和翻譯心情沉重地離開縣衙回到他們下榻的住所，大家商量，決定冒險瞞着馮知縣私自去廣州。他們找到一艘小客船，要求船長允許他們搭船。船長怕惹麻煩，不同意讓他們這些外國人上船。年輕的翻譯便機靈地將前任總督的“證書”給船長看，使船長不得不讓他們上了船。但正要啟航時，有個別乘客發現有外國人在船上，便叫嚷起來，向船長提出抗議，並威脅要把神父們的行李扔到岸上。羅明堅、利瑪竇不得不下船返回寓所。

事有巧合，馮生虞此時突然接到了他父親去世的噩訊。按照中國習慣，馮生虞必須停止一切公務，以一個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回家鄉守孝三年。這件事為羅明堅、利瑪竇得以留在香山縣等待機會去廣州創造了機會。

代理知縣鄧思渠接任後，設計用押解“犯人”的辦法，把羅明堅和利瑪竇當作俘囚“押解”到廣州海道副使府，並在公文中寫明：“這些外國神父是在香山找到的，由於某種不知的原因，他們攜有免職總督致海軍將領的‘證書’，他們是被派去見海軍將領的。”⁽²¹⁾鄧思渠還煞費苦心地讓這份公文先於神父們送到廣州給海道副使朱東光。

羅明堅和利瑪竇到達廣州後，意外地受到海道副使朱東光接待。朱東光連鄧思渠給他的那份公文也沒有打開，就詢問羅明堅、利瑪竇他們到來的原因。羅明堅和利瑪竇回答道：“為慕中華帝國之名，離開本土，遠涉重洋來到這裡，想在這裡度過餘年，祇求賜撥一小塊地方，建築房屋以及一座禮拜天主的教堂。他申明，他們不會成為別人的負擔，將以本國人民的捐獻來養活自己。”⁽²²⁾朱東光聽了這番話，表示可將神父的請求轉呈總督裁定，先同意讓羅明堅和利瑪竇暫居於暹羅賓館。

羅明堅和利瑪竇連聲道謝離去後，朱東光想深一層，怕擅留外國人暫住會招惹是非，就改變主



意，讓人傳話給羅明堅和利瑪竇：“監督官（指都察院的監察御史）預定在幾天以內抵達該省”，“如果他允許他們留在城裡，那會惹起監督官反對他。他還告訴他們，他本人是朝廷命官，所以監督官的彈劾會使他受到嚴懲。因此，他告誡他們火速返回澳門。”⁽²³⁾於是，羅明堅和利瑪竇兩人無奈地離開廣州。兩人在返回澳門途中，在香山縣城門上見到一張貼着新總督郭應聘頒發的佈告，該佈告明令禁止中國人與外國神父接觸，嚴禁外國人在省城築室而居。佈告寫道：“據各方嚴訟，現在澳門犯罪違法之事所在多有，皆係外國人僱用中國舌人所致。此輩舌人教唆洋人，並洩漏我國百姓情況。尤為嚴重者，現已確悉彼輩竟教唆某些外國教士學習中國語言，研究中國文字。此類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與私宅。茲特公告，此舉有害國家，接納外國人決非求福之道。上項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諸端活動，將嚴行處死不貸。”⁽²⁴⁾羅明堅和利瑪竇看到佈告，懷着失望的心情返回澳門。

幾天後，出人意料的變化使羅明堅和利瑪竇喜出望外。兩廣總督郭應聘經肇慶知府王泮⁽²⁵⁾重提陳

（由上至下）在利瑪竇全心攻讀漢語期間，羅明堅和巴範濟（Francesco Pasio）於1582年12月27日前往肇慶拜會駐節肇慶的兩廣總督陳瑞。不久陳總督因被指依附張居正而被解職，他在走前要羅明堅等迅速離肇，並開出一份“證書”讓他們到廣州找分巡海道副使朱東光幫忙安置，但羅明堅等人乘船到廣州後，江防守衛推說海道不在而不許他們上岸。

總督郭應聘飭令追查前總督開給神父的“證書”。羅明堅和利瑪竇為此到廣州面見海道副使。海道副使朱東光詢問他們來華原因後，表示可將他們的要求呈報制臺和察院批准，讓羅明堅和利瑪竇先回澳門等候通知。

羅明堅和利瑪竇回到澳門幾天後，肇慶知府王泮派侍衛官突然到澳門向教會遞交了一封郭總督批准他們重返肇慶的文書。他們於是改變傳教士原來裝束，做做僧人把頭髮鬍鬚全部剃光，穿上灰色僧袍。

1583年9月10日，利瑪竇與羅明堅、斐理伯抵達肇慶，在肇慶碼頭上岸。

瑞曾表態允許傳教士在肇慶居住一事，郭總督經分析情況，考慮再三，終於作出同意澳門教會傳教士到肇慶居住的決定。他同意王洋派侍衛官到澳門向教會送一封批准神父重返肇慶的公函。

羅明堅和利瑪竇接過公函，半信半疑，向信使打聽清楚才解除了猜疑，馬上商量以甚麼身份入境。他們研究了大明朝的規定，有三種外國人是允許進入中國內地的：一是前來朝貢的使者；二是隨貢使而來的商人；三是仰慕中國文化政治而來的皈依人。他們選擇了第三種。他們的提議得到范禮安支持。在范禮安看來，既然中國人能容忍來自西域的和尚，或許也能容忍他們這些白皮膚藍眼睛的洋和尚，所以他允許羅明堅、利瑪竇脫下教袍穿上佛教的僧服。范禮安這一明智的決定，也避免了中國人把他們與經常騷擾海疆的葡萄牙人同等看待。於是，羅明堅和利瑪竇改變傳教士裝束，做微僧人，剃去頭髮和鬍鬚，穿上前兩廣總督陳瑞送給他們的僧袍。

羅明堅和利瑪竇得到澳門葡商維嘉資助，一切準備就緒，於1583年9月初帶上從澳門教友中挑選出來的翻譯員斐理伯，在送公函來的那位侍衛官引領之下，登上一條駛向廣州的民船。他們悄悄地坐在船艙一角，不敢說話，怕船上萬一有人發現他們是洋鬼子而叫嚷起來，又會面臨被趕上岸的惡運。

羅明堅、利瑪竇、斐理伯三人經過一整天航程抵達廣州珠江碼頭，幾人在侍衛官護送下順利登岸，到海道副使公署辦理前往肇慶的批文。

兩天後，羅明堅和利瑪竇一行取到海道副使簽發的入境批文，立即登上駛往肇慶的船隻，從廣州出發，經三水入西江駛往肇慶。由於他們手上持有海道批文，大家也不再擔驚受怕了，在船上有說有笑了。他們與侍衛官經過幾天相處，彼此熟絡了，侍衛官在船上不時地給羅明堅、利瑪竇他們指點西江兩岸的景色。船經羚羊峽時，利瑪竇從侍衛官口中得知，羚羊峽斧柯山一帶綿連十餘里，集中了中國最名貴的硯石坑洞，這些坑洞所開採的石材，經製硯師傅雕刻成磨墨用的硯臺，稱為“端硯”。端硯石質幼嫩細膩，貯水不耗，發墨不損毫，故有“天下第一硯”美譽。

一路上，侍衛官不時對西江兩岸指指點點，把肇慶的風景、風俗、文化、特產一一介紹，羅明堅、利瑪竇、斐理伯三人聽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覺船已泊靠肇慶碼頭。

羅明堅、利瑪竇與翻譯斐理伯一行攜着行李，在侍衛官護送下，快步走上岸來，當他們踏上肇慶土地的那一刻，不約而同地向着寬闊的西江長嘯一口氣，接着又深深地吸進一口西江清晨的清新空氣。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動，特別是利瑪竇，此時此刻對於他而言，是一生難忘的。他鄭重地在筆記中記下這個日子：1583年9月10日。再過一些日子，就是他的三十一週歲生日，他感覺到自己的生命將開啟新的一段歷程。

利瑪竇和羅明堅進入肇慶後不久，為了便於與中國人交往，根據他倆意大利名字瑪竇·利奇和米歇爾·羅吉里的諧音，分別取了漢名利瑪竇和羅明堅。他們把歐洲習慣放在姓名全稱後面的姓 Ricci（利奇）、Ruggieri（羅吉里），按中國習慣放到前面，將本名 Matteo（瑪竇）、Michele（米歇爾）按中國習慣放在後面。這是他們接受的第一種中國習俗，也是他們在接受中國文化影響上邁出的第一步。從此，利瑪竇便一直使用這個中國名字。

進入府署 拜會王洋

肇慶當時是兩廣最高行政軍事機關的駐地，兩廣總督府自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由廣西梧州移駐肇慶已近十年。所以，肇慶的政治地位顯要，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成為南中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

利瑪竇與羅明堅、斐理伯心情輕鬆地跟着侍衛官從渡頭沿江堤朝肇慶府城走去。走了半個時辰，他們見江邊一處山崗上聳立着一座氣勢雄偉的建築物，屋脊上飾有黿魚和寶珠，大門兩側立有漢白玉石鼓，整座建築非常巍峨。侍衛官告訴他們，這是肇慶有名的崧臺書院。它的建築結構很特別，前後左右各一座，互相連接貫通，組成一個四合院式的建築群，中間是園林庭院，後有花園。這是肇慶學子讀書的地方，不少登臨過崧臺書院的文人騷客都



利瑪竇與羅明堅到肇慶第一天即到肇慶府署拜見知府王泮，請求得到一塊地皮建一陋寓和一座小教堂。王泮表示支持，吩咐侍衛官安頓好羅明堅和利瑪竇，並陪同他們到城內外四周遊歷，順便找塊適合他們建房舍的地方。

在此留下了想象雄奇的詩篇。侍衛官還告訴他們，這裡稱石頭岡，很早前就建有鵲奔亭，南宋時改鵲奔亭為石頭庵，祀唐代高要籍著名僧人石頭希遷，到明朝才把石頭庵改建為崧臺書院，供肇慶的學子在這裡讀書。前宰相張居正因不滿地方官借書院講學之名非議朝政，曾下令封閉了全國的書院，崧臺書院停辦後改作兵營，直到1582年張居正死了，知府王泮為了發展肇慶的教育事業，四處奔走呼籲，才得以遷走兵營，復辦書院。前總督陳瑞也因為曾依附張居正被朝廷解職。

利瑪竇他們聽侍衛官這樣介紹，對肇慶知府王泮有了一點瞭解，從王泮遷移兵營恢復書院上看得出王泮其人對文化教育的重視程度，以及他為民辦實事的精神。

崧臺書院是利瑪竇進入中國見到的第一座雄偉壯觀的四合院建築，他對別具一格的中國建築贊不絕口。

繞過崧臺書院，他們往西走了不遠，一行人經過肇慶府學宮門前，見這座學宮建築紅牆黃瓦，富麗堂皇。從崧臺書院到學宮祇有數百步之遙，卻有兩座如此華麗的建築物。所以，利瑪竇感覺到肇慶是一座富庶繁華的城市，而知府王泮是一位勤政愛民、治理有方的好官。

利瑪竇他們大約走了兩里路，來到肇慶府城的東門。這座府城城牆大約有十二米高，城基是用紅沙巖石作基底，上面全部用燒製的大塊青磚砌建，城牆上建有一排整齊的雉堞和一座兩層的城門樓。城門上下都站着守城兵丁，在四米高的城門額上，用石鐫刻着“慶雲”兩個大字，兩扇城門髹了朱紅色，門的外表還包了一層厚厚的鐵皮。木頭做的吊橋橫跨在城門前面的護城河上，兩邊的守城兵丁站在城門兩側不時地檢查着入城者的證件和物品。侍衛官領着神父們走到城門，把海道副使簽批的入境公函給守城兵丁查驗後，穿過月城從東城門走進入了肇慶府城池。

利瑪竇入城後，祇見通往府衙大街的兩側幾乎都是單層灰色房屋，一間接一間。街兩邊店舖的木漆招牌異常醒目，店舖裡擺着各種各樣貨物。大街上的人群川流不息，過往轎子不斷地穿梭於其中，非常熱鬧。

一行人跟着侍衛官來到肇慶府署。府署前有一座原是供奉宋代徽宗皇帝御書“肇慶府”而建的御書樓。⁽²⁶⁾明成化年間，知府黃瑜重修此樓，改名為麗譙樓，置鐘鼓和銅壺滴漏於樓上，作為向全城百姓公佈時間的地方。這座樓的門窗都是紅色，連首層的門拱通道都是用大塊紅沙巖石砌成。大門兩側的一對紅沙巖石獅為整座府署增添了威嚴的氣氛。

利瑪竇他們從麗譙樓下走進府署，來到了府衙大堂。大堂的屋檐上懸着“肇慶府大堂”橫匾，兩側掛着“但欲力嚴關節，敢云望重閻羅”對聯。大堂建在與月臺相連的臺基上，尤為高大壯觀，堂內中央為知府公堂，上置“明鏡高懸”匾額。

利瑪竇對中國的“衙門”文化是有所認識的：“那裡沒有公、侯、伯等分封諸侯執政，祇有總督、巡撫、知府和知縣之類的官吏執掌地方行政，一切皆由他們主持，威嚴猶如神明。”“在一座大廈，有很長的走廊，有些類似我們的聖堂，他們稱作‘衙門’，在最後呈現一座類似小型教堂（Cappella）的建築，正中設公案，好似我們的祭臺，官吏座位設在公案後面。官吏身穿華麗的禮服，胸前與背後有以金線與彩絲繡成的補子⁽²⁷⁾，由此補子可知他們官職的高低。”⁽²⁸⁾

利瑪竇見公堂上坐着一位大約四十出頭，身穿黑色綢袍，頭戴黑色紗帽，面色紅潤，表情溫和，精神奕奕的男子。他一看此人身穿官袍上的補子，便猜到此人就是知府王泮。利瑪竇隨羅明堅一齊步入大堂，按中國的禮節向王知府行下跪禮。

王泮溫和地問他們是甚麼人，來自何方，來此何事。羅明堅通過譯員回答道：“我們是一個宗教團體的成員，崇奉天主為唯一的真神。我們來自那西方世界的盡頭，走了三四年才抵達中國，我們為它的盛名和光輝所吸引。”然後他們懇求王泮“允許他們修建一棟小屋作為住所以及一所敬神的小教

堂，多少遠離他們在澳門感到惱人的塵囂以及商人的喧嘩買賣。這就是他們的打算。”⁽²⁹⁾

他們見王泮態度和藹，就“極謙卑地懇求他不要拒絕他們的祈請”，表示一定“答應不會惹是生非，遵守法紀，不會花費他人”；倘若王泮恩准，“他們永遠對他感恩不盡的”⁽³⁰⁾。

王泮是一位為人謹慎、思想開明的官員。文獻記載：王泮，字宗魯，山陰人；嘉靖間進士，萬曆間官肇慶知府；有善政，累至湖廣參政。泮性恬淡，自奉如寒士，居官廉潔，詩詞冲雅，書法逸麗。他在任肇慶知府期間，主持建崇禧塔，引瀝水由城東石頂泄澆出江，興建水利工程，治學田，開闢星巖二十景等，頗有政績。⁽³¹⁾他見羅明堅和利瑪竇兩人彬彬有禮，既謙卑，又誠懇，完全相信他們是有德行的出家人，便願意給予他們幫助，表示祇要是在他權力範圍內可以辦到的事情，都樂意給予他們支持和幫助。他讓利瑪竇他們四周去看環境，隨意挑選建居所和教堂的地皮，並吩咐侍衛官安頓好羅明堅、利瑪竇他們住下，帶他們到肇慶府城內外遊歷一番。

利瑪竇他們剛到達肇慶就得到了王泮的禮待，使他們期盼在肇慶立足出現了根本性的轉機。利瑪竇在他的劄記中寫道：“他們在長官衙門中受到禮遇，（……）他一開始就對神父表現友好，（……）完全不懷疑他們的誠實，並且願意把他們置於他的保護之下”，讓“他們可以進城看看所有可利用的地皮並隨意挑選一塊。他也努力使總督批准所請。”⁽³²⁾

遊歷擇地 初窺肇城

羅明堅和利瑪竇被王泮安排到城外離東門不遠的天寧寺旁一處房屋暫住。這座寬敞的房屋與天寧寺相通，非常清靜幽雅，這也是羅明堅上次來肇慶住過的地方。他們放下行李，休憩片刻。侍衛官按王泮的旨令帶他們去遊歷肇慶城，以便他們選擇建教堂的地方。他們重拾舊路進城，從東城門沿着城內大街直往西城門走去。上午進城時雖然也是走這段路，但因為急着要去拜見知府，祇是匆匆而過，



麗譙樓屬肇慶府署建築，建於宋重和元年（1118），乃供奉宋徽宗趙佶親筆御書“肇慶府”而建，故稱“御書樓”，明代改稱“麗譙樓”。

沒有細看。此時由於他們已得到知府同意在肇慶擇地建教堂居所，心境就不同了。他們一邊漫步細看城裡景物，一邊用搜索的目光察看哪一處地方合適用來建居所和教堂。在這兩個西方人眼中，處處都是新奇的事。

從東城門到西城門這條大路是當時肇慶府城內唯一的一條“大街”，大約兩里多長，沿路有相魁廟、金花廟、城隍廟等，整座城池幾乎都充滿了宗教氣氛，羅明堅、利瑪竇覺得這裡不適宜建教堂。他們繼續往前行，過了府署，在位於城隍廟西邊不遠的地方，看見一座廟宇裡面人頭湧湧，香火鼎盛，正門上鑲着“孝肅包公祠”的匾額。利瑪竇覺得奇怪，他們沿路所見那麼多廟宇，都沒有了一所這裡熱鬧的。侍衛官告訴他們，這是包公祠，是紀念宋代包拯的。包拯在端州主政三年，清正廉明，勤政愛民，辦了很多利國利民的好事：築堤防洪，疏通河水，以利農事；興辦書院，培育人材；鑿井修

路，修建糧倉。他還定下端硯貢品祇徵原額，不准額外加碼，任期屆滿不持一硯歸的規矩，深得百姓愛戴，故建祠紀念他。利瑪竇聽後，對包公充滿了敬意，也明白了包公祠人山人海的原因。

利瑪竇向包公祠行了尊敬的注目禮後，隨大家一齊繼續往前走，不遠處就是肇慶府城的西門。他們一行穿過“景星門”，跨過護城河，踏着田野小徑，在西門外一帶遊歷了一番。羅明堅、利瑪竇細看了城西外的崧臺驛、西教場、白沙灘和梅崗等處。他們見梅岡上綠樹環繞，四周景色清麗，覺得這裡比較適宜建教堂。但當侍衛官告知岡上有座紀念中國佛教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在此岡上插梅而建的梅庵時，他們便認為此山岡已建了佛教的庵堂，他們的教堂就不必再建於此岡上，於是放棄了在此岡建教堂的念頭。

侍衛官領着他們從城外西邊轉往北面走去，在北城門外的忠節八賢祠、慧日寺等地方又細看了一

番，覺得那裡環境雖也不錯，但建築較為密集，一時也找不到合適的地方。

當羅明堅、利瑪竇跟着侍衛官走到城外東北角時，一處風景絢麗的天然圖畫映入他們的眼簾，不由得張嘴驚歎；祇見這裡湖水浩淼，碧波蕩漾，到處綠樹成蔭，柳垂水面，隔湖望去，七座險峰矗立，怪石嶙峋，奇峰疊翠，猶如縮小了的仙景，擴大了的盆景。他們驚歎：這簡直就是人間天堂！

侍衛官像“導遊”一樣，不無炫耀地向羅明堅、利瑪竇他們宣講肇慶的風景名勝。他指着湖中遠處的巖山告訴他們，這是有名的七星巖。

羅明堅、利瑪竇他們欣賞了一番七星巖後，轉向南行，雖然一時也沒有發現適合建教堂的地方，但這次遊歷，初窺肇城，卻給他們留下了美麗之城的深刻印象。利瑪竇在信中是這樣描寫的：“這個地方實在是很漂亮，也很有活力，簡直像是一個花園，根本無法用筆畫來形容。就像我所講的一樣，在這片土地上，到處都是樹木和花草，大部分常年保持綠色。我覺得這些城市，在規模和財富，以及人口數量方面，並不落後於我們歐洲的國家，更何況它們是如此的美麗。（……）我走訪過的這幾個城市⁽³³⁾美極了，道路修整得非常好，都是用石板鋪成的，有很多‘凱旋門’，很像羅馬的，這些拱門獻給將城市管理得很好的地方行政官。有一些傑出的作品上面鐫刻着短詩或者警句，在石頭上還雕刻上了解釋，看上去比我們的還漂亮。宮殿也很多，雖然不及歐洲的數目大，但是總督和地方行政官的宮殿外表確實異常漂亮，他們不辭辛苦地將自己的地方裝修得美麗而迷人。他們的廟宇也都是有一定順序的，宮殿裝飾得流光溢彩。但是每個地方行政的處所又有所差別。（……）我相信過着這樣生活的人們，肯定不會再期盼另外一個天堂了。”

利瑪竇與羅明堅幾乎繞肇慶府城走了大半圈，沒有選擇到適合建教堂的地方。他們回到天寧寺旁的居所時，一位叫做陳理閣的當地儒生已在那裡等候他們多時。羅明堅一進門就見到他上次來肇慶結識的朋友，真是喜出望外。兩人親切地互相問候，羅明堅高興地告知陳理閣，他這次是得到了郭總督的俯允和王

知府的邀請而來的，有正式的入境批文，他們一到肇慶，就馬上去拜見知府大人，有幸已得到王洋知府的答允，撥一塊地皮建教堂和居所，但在城內和城外的西、北地段轉了一圈，未找到合適的地方。

陳理閣是個肇慶通，他聽到羅明堅這樣一說，就對他的朋友講，城東外不遠有一處地方可能會比較適合，那裡離城不遠，風景優美，人口也不算很稀疏，你們可以去那裡看一下。

羅明堅、利瑪竇一聽，也顧不得休息了，請陳理閣馬上帶他們去看。

陳理閣帶着羅明堅、利瑪竇一行人沿江向東走了大約四里路，見江邊有一處搭了竹排柵的建築地盤。這建築地盤所在的地方非常優美，它處於一塊突向江水的石岡上，南臨西江，西邊有一條流向西江河的小河涌，周圍有園林花園，樹木繁茂，東北面還有成片的居民區，地域開闊，沒有城裡那麼擁擠，也不荒涼。

神父們詢問陳理閣這是甚麼地方，這裡正在建甚麼建築物。陳理閣告訴他們，這地方是小市石頂，這裡正在建造一座塔。利瑪竇從未聽過塔這種建築物，所以向陳理閣請教甚麼叫“塔”。

中國的塔其建築式樣多數是八角形，常為五、七、九層，高約數十丈。從印度傳進來的窣堵坡被縮小了，安置在塔的頂部，稱它為剎。陳理閣還告訴利瑪竇，這塔在1582年（萬曆十年九月）開始動工建造，目前已建好了臺座和第一層塔身，整座塔準備建十七層，但從外看就祇有九層⁽³⁴⁾，平座和塔簷裡隱藏了八層。塔內有穿壁而上的階梯通頂層，每層樓板準備選用上好的木料，每層瓦面也準備用玻璃瓦來鋪蓋，塔簷的面上還準備懸掛七十二個風鈴，塔頂部裡面準備用鐵鑄造。陳理閣向羅明堅、利瑪竇炫耀自己家鄉這一偉大工程。

陳理閣見羅明堅、利瑪竇他們聽得那麼入神，又那麼有興趣，就把他們帶進建塔工地內參觀。陳理閣與建塔的工人非常熟絡，他是這裡的常客，大家見他來到工地，都熱情地與他打招呼。

利瑪竇見已建好的塔臺座八個角都嵌着花崗巖托塔力士。這些石雕力士栩栩如生，有用頭頂的，

有用肩扛的，有用手擎的，造型生動，利瑪竇對中華民族兼收並納外來文化來豐富自己的民族文化表示歎服。

由於崇禧塔所處的地理位置優越，四周景色宜人，況且離碼頭又那麼近，交通非常方便，利瑪竇覺得這裡是一塊理想寶地。羅明堅也看中了這地方。從陳理閣口中，利瑪竇他們還得知，“在建塔的土地上，他們也規劃修築一座宏偉的寺廟”（指王洋的生祠），“在廟內立一尊長官（指王洋）的塑像，他任職六年來博得了智識階層和無知識的群眾的頌揚”。此時，陪同羅明堅和利瑪竇遊歷的侍衛官也“向他們指出，該地是他們修建房屋的理想環境”。而羅明堅和利瑪竇“對該地的第一印象很好，因此他們當場就決定申請正在興建中的花塔附近一塊地方”⁽³⁵⁾。

羅明堅、利瑪竇決定選擇這裡建教堂，第二天早上，他們又到府衙拜見知府王洋。羅明堅先開口向王洋講，已選定了東門外小市石頂建塔工地建教堂居所，他們懇請王洋能夠在塔的附近劃一塊地皮給他們建教堂。

王洋告訴他們，這座塔以及周邊建築的用地都是由他劃撥的，塔的建築設計佈局也是“在他的批准下進行設計的”，並已為這座塔定名為“崇禧塔”，他準備把這座塔作為一件吉祥物來獻給肇慶百姓。王洋認為利瑪竇他們選定在塔附近建居所，是為塔的環境增添了一道風景，讓崇禧塔增色，“顯得更體面，更尊貴”⁽³⁶⁾。王洋要羅明堅、利瑪竇他們放心，他會馬上把他們的請求呈總督批示，讓他們先回去等候。

羅明堅、利瑪竇他們回到住所等了兩天，由於還沒有收到王知府的任何消息，不免有些焦慮擔憂。但他們並沒有等多久，在基督昇天節那天，王知府的侍衛來請他們到府衙。

利瑪竇和羅明堅心情忐忑地來到府衙。他們見王洋滿臉都是笑容，頓時把緊張的心情放鬆了下來，他們猜到這事已得到總督批准了。

王洋知府告知他們，雖然有禁例不能讓外國人在國內居住，但對仰慕中國文化政治的人，凡自願

不回本國而又能安份守己在此自食其力的，都可特許居留，總督已根據他們的情況特批了他們在這裡建教堂居所的請求。

羅明堅、利瑪竇非常高興，向王洋知府跪揖道謝。王洋接着要他們承諾：第一、要做大明國皇帝的子民，遵守大明的律例；第二，要服從官府的管理，遵守鄉規民約；第三，要穿我國的服飾，遵從我國的習俗；第四，若要娶妻，須娶我國的女子；第五、不能再把其他外國人帶進肇慶來。“當時，利奇定居在肇慶，他不得不向當地官員保證，他不會把任何人從澳門帶入肇慶”⁽³⁷⁾，並表示一定按王洋知府的要求去做。

王洋也滿意地約他們第二天一齊到崇禧塔去商議劃地事宜。利瑪竇與羅明堅期待已久的願望終於可以實現了，他們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期望在中國內地建第一所教堂的機會終於來臨，他們為此興奮至極。

第二天一早，羅明堅、利瑪竇一齊到了建塔工地，王洋知府早已在那裡等候他們了。站在王知府身後的是建塔機構的幾個負責人。王知府把羅明堅和利瑪竇介紹給他們認識後，便把建塔機構的負責人介紹給神父們認識。王知府指着身旁一位年過六旬、身體瘦削、沉着穩重的男子，向神父們介紹說他叫譚諭⁽³⁸⁾，是崇禧塔建設機構的管事，舉人出身，曾任五河縣知縣，告老還鄉後在肇慶擔任多宗公共建築的管事，譚諭經驗豐富，處事老練，所以請他來負責崇禧塔的建設和籌款事宜。王洋介紹了譚諭後，又把建塔機構的其他成員逐一作了介紹，然後王洋請譚諭他們在崇禧塔附近劃出一塊地皮來給神父們建教堂。

建塔機構的人聽到王知府要在崇禧塔地盤上劃地給外國僧人建房子都感到很意外，他們七嘴八舌地嚷着要王洋慎重考慮，他們擔憂若讓這些外國僧人在這裡建房子留住，日後他們把澳門的洋人招惹進來，就很麻煩了。

王知府聽完眾人的意見，對他們的擔憂也是理解的。1513年，若干葡萄牙商人便抵達中國沿海，1517年，葡萄牙國王派使臣皮雷斯以“佛郎機國”特使身份謁見中國國王為名，來到虎門及廣州。他們



賄賂掌權太監使明武宗批准他們在1520年進入了北京。是年底，明武宗收到了滿刺加⁽³⁹⁾國王的求救奏章，才看清“佛朗機”⁽⁴⁰⁾人的侵略面目。1521年，明政府囚禁了皮雷斯，並發兵驅逐盤踞屯門的葡萄牙人。明軍在屯門及新會西草灣之戰中獲勝，葡萄牙人被迫撤離廣東沿海。1535年，中葡停息干戈，廣東把“市舶提舉司”遷到澳門，允許外國商船入泊濠鏡澳，葡人開始在澳門築屋居留，逐漸把澳門發展為外貿和傳教基地。但葡人在濠鏡建立居留地後，其駐印度果阿的葡人總督卻無視中國對濠鏡澳的主權，擅自將這一居留地隸屬於果阿，並

(由上至下) 羅明堅和利瑪竇在侍衛官帶領下到肇慶城內外四處遊歷參觀。當他們來到城東崇禧塔工地，見這地方非常優美，塔的南邊是西江，東邊有大片民宅，既沒有城裡那麼擁擠，又不至於荒涼，周圍還有園林，覺得十分理想，於是決定選擇這地方建造教堂。

羅明堅和利瑪竇再去拜見王泮，懇求在崇禧塔附近劃一塊地皮給他們建造教堂和住所。王泮爽快地答應代他們向郭總督呈稟，提請總督批准。

利瑪竇要求撥地的請求得到郭總督批准後，1583年9月15日，他們來到崇禧塔工地，王知府吩咐建塔機構負責人譚諭具體操辦劃地事宜。但建塔機構的人一齊提出異議，王知府力排眾議，在崇禧塔北面劃了一角土地給神父，卻因所劃地皮太小，容不下一座教堂和一所住房，於是王泮又把所劃的地皮擴大到一畝多。

規定在這塊居留地生活的葡人要服從每年從印度前往中國、日本的中日貿易船隊司令的管轄。1582年4月，一夥西班牙人在耶穌會士桑切斯的引領下於福建登陸，他們於5月來到廣東。前總督陳瑞還因此傳喚過澳門主教等到肇慶作答。王泮對這些情況也有所知，所以，他並不苛責七嘴八舌大聲反對的人們，而是回過頭來問羅明堅和利瑪竇是否會遵守不會再帶其他外國人來肇慶的諾言。

羅明堅和利瑪竇連忙回答說一定會按王泮的要求去做，不會帶其他的外國人到來。

王泮見譚論一語不發，也顧不得其他人再行反對，就作出決定，在建塔規劃用地之北面劃了一塊地皮給神父們。

由於所劃的這塊地皮太小，不能同時蓋一座教堂的和一所住房。於是，羅明堅和利瑪竇懇求王泮再劃大一點地皮。

為此，王泮又與大家商量了一會，討論了神父提出的增地要求。王泮最後還是力排眾議，作出了增加地皮給神父的決定，在崇禧塔北面中軸線上劃出了一畝多土地。

羅明堅和利瑪竇幸慶自己在肇慶遇到了這位開明而且極有威望的地方官，使他們進入中國內陸建第一座教堂的計劃得以實行。但他們也明白，建塔機構的多數人都在反對，祇是基於地皮是出於知府大人所賜，不好當面反對，所以非常擔心建塔機構的人會因此而製造諸多麻煩。

羅明堅和利瑪竇立刻在靠近崇禧塔工地附近租了一間民房，把天寧寺旁住所的行李迅速搬到房子裡。他們又用磚搭建了一個臨時窩棚做工場，把大部分時間都放在規劃繪圖、尋找建築工人和購買建築材料上，以求能夠盡快開工建設，以免夜長夢多。

調換地皮 營建教堂

利瑪竇把設計好的教堂和居所圖紙以及施工方案送給負責營建崇禧塔的管事譚論報建時，譚論大吃一驚地盯着圖紙。譚論這時才完全清楚神父們在建甚麼東西。

當羅明堅、利瑪竇備好建築材料準備開工時，譚論把他們召了去，通知他們不能這樣就開工。理由很簡單，說是他們所選擇動工的日子不吉利，必須要按照中國的曆法選擇一個吉利的日子，搞一個開工大吉的儀式，才能夠奠基開工。

羅明堅和利瑪竇明知這是譚論他們在耍手段，有意拖延開工時間，想方設法阻止他們在這塊地上建教堂。但是，他們對此也無可奈何，祇得按譚論提出的方法去辦，另選擇一個所謂吉利的日子作為開工奠基日，這樣也算遵循了中國本土的習俗。

開工那天，下起傾盆大雨。羅明堅和利瑪竇為使工程不再延誤，也顧不得那麼多了，通知工人按時舉行開工儀式。但雨下個不停，開工儀式根本就不能進行。天意如此，羅明堅和利瑪竇也不得不擱置了開工儀式。

建教堂的工程一再被推遲，這對羅明堅和利瑪竇，可以說是一件倒楣的事。但“那也許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因為它防止了可能的麻煩”⁽⁴¹⁾，這倒楣事竟因此由壞事變成了好事，它使建塔機構一方與神父一方的地皮矛盾得到和平解決。

傾盆大雨時，羅明堅他們祇得在工棚裡默坐。利瑪竇見羅明堅愁眉苦臉一語不發，就向羅明堅提議說，與其大家都閑坐在這裡，不如一齊去找建塔機構的譚論好好談談，向他請教，也許事情會得到解決。

一語驚醒夢中人，羅明堅馬上和利瑪竇一起，打着雨傘到隔壁的崇禧塔工棚去找譚論。

譚論與一班工人正坐在工棚裡飲茶聊天，見羅明堅、利瑪竇他們冒着大雨造訪，雖然對他們有意見，卻不失儒者風度，有禮貌地請神父們坐下，吩咐倒茶，然後問他們冒雨到來有甚麼事？

羅明堅向譚論他們作揖，並作了自我介紹，說明他們是出家人，來自印度，仰慕中國的興盛昌明，所以來到中國，希望在這裡定居，建一間小寓所和一座小教堂，以避開澳門的紛擾喧嘩。

利瑪竇也站起來向譚論講，他們是受到總督大人的邀請辦了正式的入境批文，才得以來到肇慶

的。肇慶是一塊人傑地靈的寶地，希望能在這裡長久生活，與中國人和平相處，瞭解中國的風俗和人情世故。他請譚論多給予提點，表示將感恩不盡。利瑪竇這番話，拉近了他們與譚論的談話距離。

譚論聽後，心裡舒服了很多。他不但知道了羅明堅和利瑪竇的來路，而且被他們誠懇態度和彬彬有禮的舉止所打動，雙方之間開始有了一些好感以及利於協商的氣氛。譚論向羅明堅和利瑪竇解釋，現在所建的這座塔是風水塔，若教堂建在肇慶風水塔的重要位置上，當地人會認為是破壞風水的。

利瑪竇聽後恍然大悟，原來中國的建築如此講究，倘不弄清楚，強行上馬，肯定會釀成大錯。於是他誠服地請教譚論何謂風水塔。

譚論告訴利瑪竇，由於盛行科舉和經商，百姓認為興文經商能改變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所以為祈求文運財運，百姓選擇風水地建塔。傳說肇慶這塊狹長的陸地被西江和瀝湖水夾在中間，像一塊漂浮在水面的竹筏，而建這座塔像一枝大竹篙把肇慶這片狹長的沙洲牢牢插住，使它不被洪水沖走；也有風水先生說這石頂下是河妖和水怪出沒的地方，在此建塔可以鎮住河妖和水怪。

但王知府是個極開明的人，他在這裡建塔最看重的還不是這兩個原因。

利瑪竇急著想知道建這座塔的真正原因，所以謙虛地向譚論詢問。譚論告訴利瑪竇，王知府在這裡建這座塔前，曾召集當地的鄉紳父老和有識之士商談過，王知府綜合了大家的意見，才作出了在這裡建塔的決定。因為中國傳統以水為財，一個地方的河流蜿蜒曲折山環水抱才算得上是藏風聚氣的風水寶地，而肇慶的西江河雖也屬環帶水，其彎流浩蕩，江面遼闊，滔滔東去，然而河面缺乏九曲十八彎，江水仍有直瀉之勢，難留財氣。在此建塔，以人工來營造一個九曲十八彎的局勢，以聚風聚氣，束住西江水直瀉，這樣不但能鎖住肇慶西江兩岸的山川靈氣，孕育英才，使肇慶文化興盛，而且能使它像一個聚寶盆留住江水財氣；加上這座塔建在府城的東方貴位上，使府城東邊青龍位高聳起來，得

以形成文武雙贏的風水格局，成為一塊聚氣的風水寶地，可納西江之氣，造西江人之福，因此塔名定為“崇禧”，就是指大吉大利鴻福無疆。

譚論講到這裡，看了看羅明堅和利瑪竇，然後取出崇禧塔的建設規劃圖，指着圖對他們講，這座崇禧塔建在石頂岡的正中位置，在塔中軸線的北面，原來還規劃要建一座佛殿，在塔的西邊將建一座王泮知府的生祠，現突然要在崇禧塔北面建教堂，破壞了原來已規劃好的整個計劃，對崇禧塔的風水影響甚大。

譚論說到這裡，站起來走到羅明堅和利瑪竇身邊，指着他們穿的服裝講，你們穿的是僧人的衣服，自稱是印度來的西僧，王知府在塔北面的中軸線上劃地皮給你們，誤認為你們是想在這裡建一座寺廟，供人禮佛。按中國的習慣，在塔的北面建佛殿，與塔同在一條中軸線上，塔在前，供百姓登臨閱江，佛殿在後，供人們燒香拜佛，這完全符合中國佛教建築早期的做法；但看了你們送來的建築圖紙才知道並不是在建佛殿，而是在建你們國家式樣的建築。所以，譚論建議羅明堅和利瑪竇放棄這塊地皮，將建設地點移離崇禧塔這條中軸線。他告知羅明堅和利瑪竇，在崇禧塔東邊有一塊用地，原計劃是用來建荃香室香緣堂之類的建築的，那裡靠近路邊，非常適合建教堂，教堂的大門還可獨立開在崇禧塔牆外的路邊，獨為一所，不用經過崇禧塔的大門出入，與崇禧塔互不相干。這樣一來，既不破壞崇禧塔中軸線上的建築風水，又不妨礙原先在塔內建廟宇的計劃。譚論“作為交換，將另撥給神父們一塊靠近大路的地皮，在那裡他們房屋的門口將開在這片土地的範圍之外”⁽⁴²⁾，使之兩全其美。

羅明堅和利瑪竇“本可以得到原來打算修建佛寺的一塊賜地”⁽⁴³⁾，但他們聽了譚論這麼一說，便非常明智地“欣然接受了調解。這樣，雙方都感到滿意。”⁽⁴⁴⁾羅明堅、利瑪竇他們稍為交換了一下意見，馬上表態，同意更換地皮。他們知道，譚論是王泮的至交好友，利瑪竇在其劄記中記載：“嶺西道（按指王泮）有個叫譚君論的密友，肇慶人，是修建城塔的監督官；此人像中國人的習慣那樣，好廣



譚諭於是向羅明堅和利瑪竇提出調換地皮，將教堂建設地點移離塔的中軸線，用塔東側路邊的地塊與之對換，教堂大門獨立開在塔圍牆外，獨為一所，說明這樣既不破壞崇禧塔中軸線上建築整體，又不妨礙原先在塔北面建廟宇的計劃，兩全其美。這意見很合羅明堅和利瑪竇的心意，上述雙方的地皮矛盾得到了圓滿解決。



羅明堅回澳門籌款，利瑪竇在肇慶獨力支撐建教堂的工作，他賣掉一隻從歐洲帶進中國被人稱為“無價寶石”的三稜鏡後，馬上抓緊教堂工程繼續開工。



1584年上半年建好教堂第一層。但由於等不到羅明堅從澳門攜款回來，利瑪竇暫時擱置了建第二層的計劃，把已建好的第一層教堂作簡單佈置，中間的廳堂用作聖堂，掛聖母畫像，對兩側的四個房間都一一作了安排。

交朋友。”⁽⁴⁵⁾所以，羅明堅和利瑪竇便懇求譚諭向王泮知府代為求情，幫他們提請更換地皮及辦理更換地皮的工作。雙方在地皮上的矛盾就此得以圓滿解決，爭執遂告結束。

在譚諭的幫助下，神父們的換地請求很快就得到了王泮的批准。利瑪竇辦妥了更換地皮的手續，並順利舉行了開工奠基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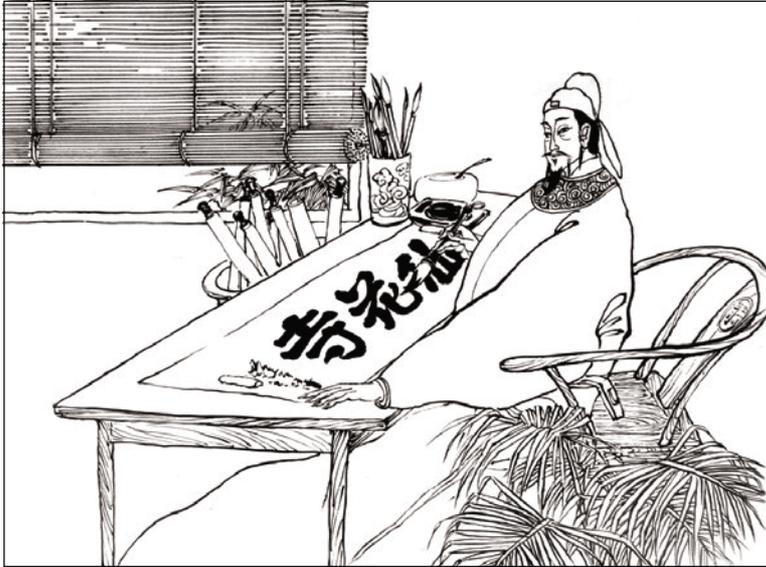
利瑪竇設計的教堂樣式是一座兩層的歐式教堂。羅明堅敲定這個設計方案後，就開始施工。

教堂工程在打完地基後，由於澳門教會這時的經濟遇到了困難，無力支援教堂的建設，使肇慶教堂在建設資金上難以為繼。工程眼看就要因此而停工，利瑪竇抱着試試看的心態去找譚諭求援，想借一些建材應急。想不到這位譚老先生滿口答應，“運給神父們幾千塊磚瓦和大量的木料，以加緊完成他們已經開始的工程”⁽⁴⁶⁾。利瑪竇對此銘記於心，他贊歎中國人的大方豪爽，很感動地把此事記錄在他的日記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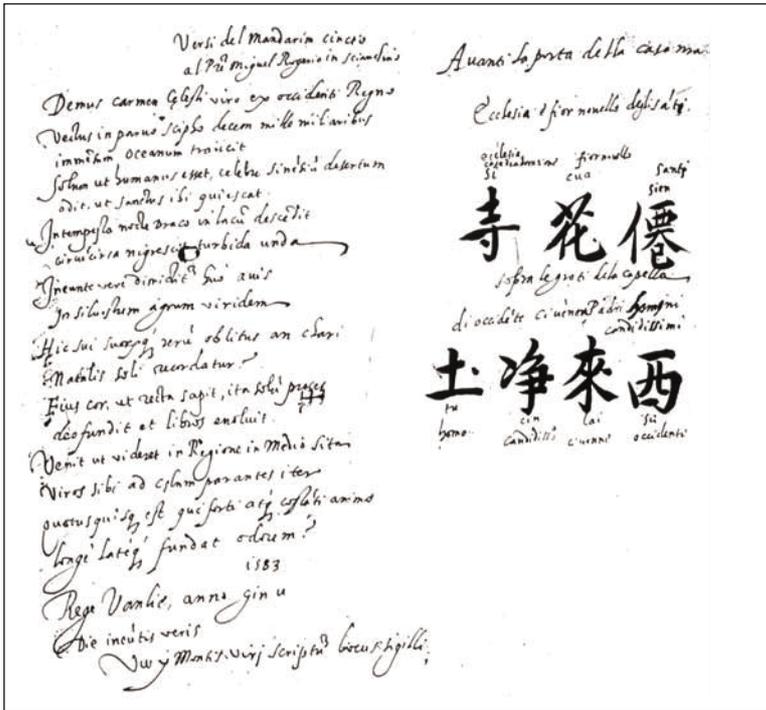
經費狀況一天不如一天，羅明堅、利瑪竇已陸陸續續地借了不少債。1583年12月羅明堅終於決定帶着翻譯斐伯理返回澳門籌措經費。他返回澳門後，見澳門教會這時候的確非常艱難，不能施以援手。澳門修道院院長看了羅明堅帶回的教堂圖紙後，建議羅明堅放棄建兩層樓房的計劃，一來可減少工程的開支，二來也可免去當地人誤認為他們是在建碉堡的疑心，要他們“放棄蓋兩層樓房的想法為妥”⁽⁴⁷⁾。但羅明堅為了讓那打了兩層地基的教堂工程不至於半途而廢，還是積極想辦法到處籌款。然而他努力了一陣子，還是一無所獲，為了不空手回肇慶，決定繼續留在澳門籌款，“這使得他把歸期推遲了整整一年”⁽⁴⁸⁾。

利瑪竇在肇慶獨力支撐教堂的建設工作，由於欠債太多，再也借不到錢。他決定賣掉一些從歐洲帶來的器物，換取資金來完成教堂的建設。他找到了一位買主，賣掉了三稜鏡，得到二十兩銀，馬上組織工人繼續施工。

1584年上半年，利瑪竇把教堂的首層建好了。教堂是五間房的，中間大的做廳堂，兩側各



利瑪竇將這座教堂命名為“聖童貞院”。王泮按中國傳統習慣，讓衙差敲鑼打鼓送去他親筆題辭的“西來淨土”和“僊花寺”匾額。利瑪竇按王泮的要求，把“僊花寺”匾懸掛於教堂大門上。正是因為這匾上的雅號，人們從來沒有把這座教堂稱作“聖童貞院”，而習慣把它叫做“僊花寺”。



教堂首層落成使用之日，王泮為利瑪竇親筆題寫了兩塊匾額，以示祝賀：一塊題辭“西來淨土”，另一塊題辭“僊花寺”。肇慶教堂題字的刻文現藏於耶穌會意大利羅馬檔案館。

有兩個房間。由於等不到羅明堅從澳門攜款回來，他就暫時擱置了建第二層的計劃。他把已建好的第一層教堂作了簡單的佈置：中間的廳堂用作聖堂，其中央佈置聖壇，聖壇上方的牆上掛聖母像。廳堂兩側的四個房間，除了一間用作寢室外，其餘三間用作西文圖書室、天文儀器陳列室、世界地圖展示室和繪製室。

利瑪竇一面忙着佈置教堂，一面忙着去拜訪知府王泮及有關官員，懇求官員批辦這所房子的土地及房產證。

兩廣總督郭應聘為此頒發了佈告，把佈告張貼在教堂大門旁邊的牆上，宣告西僧入住是經他批准的，任何人都不得用任何方式欺凌他們，違者嚴懲不貸。

知府王泮給利瑪竇辦理了兩份蓋着府衙官印的文件，一份是同意劃撥這塊用地給神父們建教堂居所的批文，另一份是允許利瑪竇他們到省會等地旅行的批文。

利瑪竇將這座教堂命名為“聖童貞院”（Church of the Holy Virgin）。在擇日啟用時，知府王泮“決定賜給他們一種中國人很重視的恩寵”，“送給他們一塊製作精美、飾有彩色的匾作禮物”，“這塊匾的正面刻有三、四個稱頌被尊敬人的大字。字下面一邊用小字刻着敬獻給其友人的這個官員（指王泮）的姓名頭銜，另一邊刻着贈禮的日期”，“肇慶長官採用這種特別的方式來榮寵

他給予保護和支持的那些人”⁽⁴⁹⁾。在送匾的那天，王泮還按中國傳統習慣，讓衙差敲鑼打鼓送去這兩塊他親筆題辭的匾額，以示祝賀。其中一塊題辭“西來淨土”⁽⁵⁰⁾，另一塊題辭就是“僊花寺”。在王泮的眼裡，這兩個西僧除了藍眼睛、高鼻子、白皮膚這種相貌特別之外，其穿着打扮，淨鬚剃髮與中國的出家人並無兩樣，羅明堅和利瑪竇又口口聲聲以西僧自稱，當然是佛門弟子了。故王泮認為，西僧所講的教堂就是與中國寺廟屬於同一類的，況且祇建好一層的“聖童貞院”尚沒有展現出多少歐洲建築的獨特樣式來，看起來像中國的普通房屋一樣。特別是利瑪竇在聖壇上掛着一幅栩栩如生的聖母油畫像，給王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泮驚歎她就是仙界上像花一樣美麗的“觀世音”菩薩，所以王泮為掛着聖母像的教堂命名為“僊花寺”。利瑪竇則把“僊花寺”這三個字解讀為聖賢們秀麗的居所，他把該匾額隆重地掛在教堂的正門上方，把“西來淨土”這塊匾額掛在聖堂內。

這“僊花寺”畢竟是官賜的名，加上匾額就掛在教堂正門的上方，十分醒目，來來往往的人一眼望見，就都記在心上。所以，人人都稱這座教堂為“僊花寺”⁽⁵¹⁾，沒有人稱它為“聖童貞院”，利瑪竇等也樂於接受這一漢語名稱。

這兩塊製作精美的匾額向人們顯示了利瑪竇他們極受王泮等達官貴人官府老爺們的禮遇。知府親筆為西僧教堂題匾的事很快就傳遍了整座肇慶府城。僊花寺連同它室內展出的書籍、地圖和天文儀器頓時名聲大噪，肇慶的大小官員們紛紛與利瑪竇交往。

利瑪竇為了答謝兩廣總督郭應聘的支持，特地帶着禮物到督院去拜訪總督。但郭應聘並沒有接見利瑪竇，他謝絕了利瑪竇的拜訪，拒絕了利瑪竇的謝禮，讓手下將禮物全數退還利瑪竇：“他祇是讓人傳話：不必拜訪他，也不必費心禮物”，他要利瑪竇“他們安靜地住在指定給他們的地方，那就夠了”⁽⁵²⁾。

當地百姓見到僊花寺大廳聖壇上那幅聖母抱小耶穌的油畫，都誤認為是“送子觀音”，“人人

都向聖壇上圖畫中的聖母像敬禮，習慣地彎腰下跪在地上叩頭”⁽⁵³⁾。把僊花寺當作是中國的觀音堂，攜男帶女地去燒香敬拜，把僊花寺搞到整天香煙繚繞，他們還把一身僧人打扮的利瑪竇當作是寺中僧人，百姓隨便入內參拜，把教堂當作佛教寺院。“其中一些人，不經人請求或者告訴，就上香祈福，另一些人給聖燈送油，少數人還自動送東西支持教堂。”⁽⁵⁴⁾連官員都把利瑪竇的寓所看成是佛殿。利瑪竇為了避免使這種張冠李戴的場面越演越烈，就把聖母像換成一幅耶穌像，把聖母畫像移掛到小堂裡。

1585年，羅明堅期望已久的葡商貨船從日本獲利駛回澳門⁽⁵⁵⁾，羅明堅得到葡商們的慷慨解囊，得以攜帶足夠的資金返回肇慶。

當羅明堅回到教堂時，他見到教堂的第一層已完成並已佈置使用，見到王泮送給教堂的親筆題匾挂在大門上，見到利瑪竇已經辦妥了教堂的用地和房產手續，真是欣喜若狂，兩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由於資金充足，羅明堅和利瑪竇馬上按原計劃組織建設教堂的第二層。他們還對教堂的內外大門、窗戶進行了重新修飾。教堂於1585年11月24日竣工。當天，利瑪竇在肇慶致富利卡提神父的書信中寫道：“今天鐘塔要落成，是八角形有十八尺高，相當高而美觀。在頂端我們置一鐵柱，最上有一鍍金銅球，用兩條鐵絲繫牢。我們的房舍也建好了。”⁽⁵⁶⁾“上層有四個房間，中間為起居室，正面有一陽臺，左右各有一回廊；下層除房間外，中間還有一座小聖堂。”⁽⁵⁷⁾“中國人一看它就感到很愜意，這是座歐洲式的建築物，和他們自己的不同，因為它多出一層樓並有磚飾，也因為它的美麗的輪廓有整齊的窗戶排列作為修飾。”⁽⁵⁸⁾這座按歐洲式樣來增建和重新修飾的僊花寺與中國的傳統房屋完全不同，它不但多出一層，而且正面是以三角形的尖頂指向天空，屋頂上飾有十字架標誌；窗戶整齊地排列着，而且帶着歐式的浮雕線條，輪廓分明，就像一組和諧的音符；正門兩側的柱子，還雕有渦形捲曲的柱頭裝飾。從教堂的第二層陽臺望去，南

可俯瞰滔滔江水和對岸鬱鬱蔥蔥的山巒，東可覽古渡頭和羚羊峽，西可望雄偉壯觀的肇慶府城。羅明堅與利瑪竇為自己的傑作而陶醉，他們又拿出錢來為教堂添置了不少傢俱，還拿出二十兩銀，把緊靠教堂的幾間房屋買了過來，拆除後建成教堂的花園，再用青磚砌了圍牆，把整座教堂和花園圍起來。僂花寺與崇禧塔⁽⁵⁹⁾兩座建築物並排立於江邊：一座高聳入雲雍容華麗，一座樣式奇特裝飾奇異，在大片普通民居裡，顯得異常突出，無與倫比，成為一時人們爭先遊覽的勝景。

僂花寺是利瑪竇進入中國內地後建立的第一所天主教堂，由於它與崇禧塔並列聳立在風景秀麗的西江河畔，佔盡地利，人們登臨崇禧塔覽勝的同時，往往還到僂花寺去見識西方教堂的陳設以及各種新奇物品，聆聽利瑪竇講西方國家的風俗文化、地理狀況，以及西方的科技知識。一時間，“引起多人常來參觀，屋內的一切對中國人都是不曾看見

過的，尤其三稜鏡，他們稱它為‘無價之寶’。”⁽⁶⁰⁾僂花寺名揚省內外，教堂兩邊街道擠滿了轎子、馬車，江面擁塞着外地來的大小船隻。教堂經常有客人，“有的是來看我們的房屋，因為它和中國人的建築不一樣，這是他們從來不曾見過的。尚有來看西歐式聖像的，有看洋書的。”⁽⁶¹⁾大家都想來中國大陸第一座天主教堂開開眼界，“來訪的高官絡繹不絕，其中不僅有來自本城的，還有從其它省份來見總督的官員。”⁽⁶²⁾

苦學漢語 大膽運用

利瑪竇把大部分時間用於研習中國的語言文字上。他最初接觸漢語時就有這樣的感覺：“中國語文較希臘文和德文都難；在發音上有很多同音而異義之字，許多話有近千個意義，除掉無數的發音外，尚有平上去入四聲；在中國人之間，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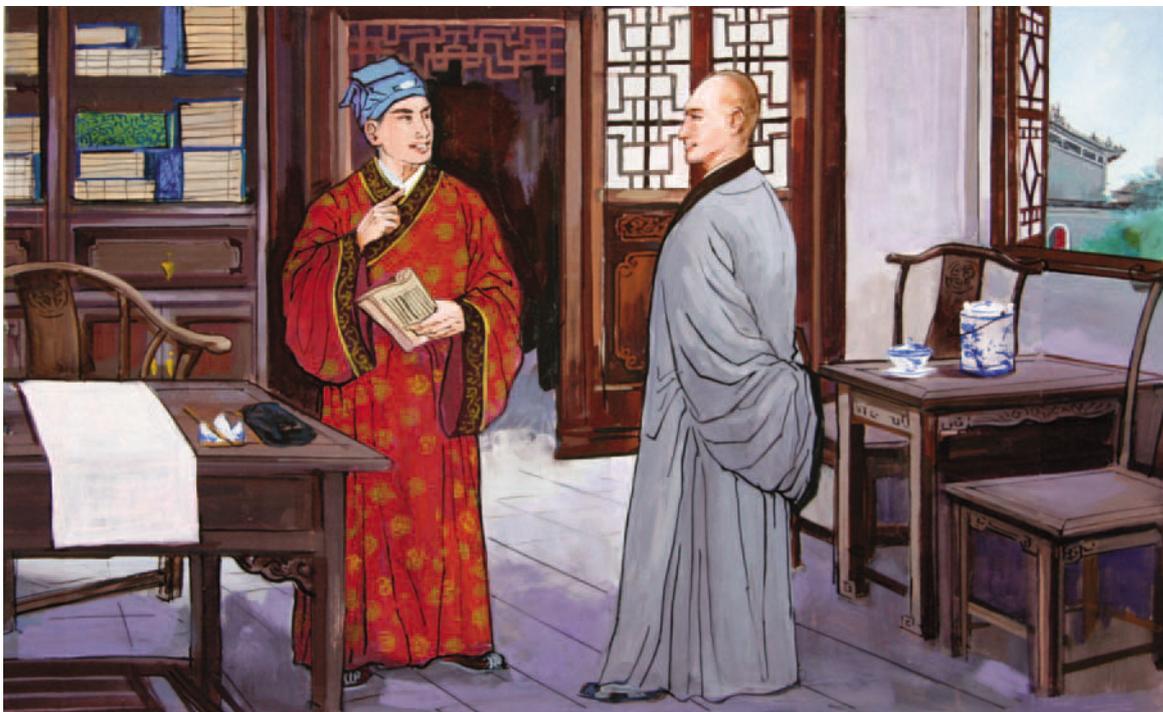


利瑪竇勤練漢語，為了正確掌握漢字語音和貫通中西文字的字義，他與羅明堅在肇慶合編了一本《葡漢辭典》，取名“平常問答詞義”，成為中國第一部中西文辭典。

時還須藉筆寫以表達他們的思想，但文字在他們之間並無分別。不過中國文字的構造實難以形容，除非親眼見、親手去寫，就如我們今天正學習的，真不知從何說起。有多少話、多少事，便有多少字，好像七萬左右，彼此都不一樣，非常複雜。”“所有的話皆是單音的，他們的書法幾乎等於繪畫。因此他們用刷子（按指毛筆）寫字，正如我們用它畫畫一樣。”⁽⁶³⁾利瑪竇有學習語言的特別天賦，他學習過多種語言，卻感到中國這些方塊象形字令他頭痛。然而，在他刻苦學習了一段時間後，便感到“略有成就”。1583年，他寫信回歐洲這樣說道：“儘管文字很難辨認，況且每一種東西都有自己的文字，可想而知，這樣就會有多少辭彙，在世界上每個都不相同的情況是不多見的，而中國人卻能學會這種文字。（……）我們開始建造房子和教堂，應該很快就可以建成了。（……）不蓋房子的時候，我們就學漢語言和文學，憑藉上帝的引導，我們不斷取得進步。”

利瑪竇明白：“在中國誰識字越多便是最有學問的人，祇有這些人才能擔任官職，在社會中才有地位。”⁽⁶⁴⁾為了加快學懂和精通漢語，1584年5月，羅明堅、利瑪竇“以高薪聘請了一位有聲望的中國學者，住在他們家裡當老師”⁽⁶⁵⁾。這位秀才有豐富的藏書，官話水平也較高。利瑪竇在他那裡看到了一些中國書籍，使他瞭解到“整個中國是塊生產各種水菓的肥沃土地，雖然，還有許多種類，是我們所沒有的，他們書籍記載，在別處還有別不同的水菓。木材也不缺少，因為有大山脈。”⁽⁶⁶⁾利瑪竇除了孜孜不倦地閱讀中國書籍、向他的秀才老師請教書中所寫的內容外，主要是向他的老師學習漢語，學習官話，也學習肇慶地方的方言。

為了學懂漢語和瞭解中國文化，利瑪竇一邊跟他的秀才老師學習漢語，一邊去與肇慶的官員和儒生一起聚談，一同暢遊肇慶的名勝古蹟，從而使他在漢語筆寫和口語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並且對中國的文化和習俗等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瞭解。利瑪竇



利瑪竇和他的秀才老師兩人用五個多月時間合編了一本教理書《天主實錄》，成為中國天主教第一本教理書籍，於1584年11月29日脫稿付印。利瑪竇將它送給各級官員和知識階層，通過他們傳到全國各地。

於1583年在肇慶用意大利文寫了一篇名為“中國紀事”的信向澳門耶穌會彙報他在肇慶所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認識到的事物：“現在居住於中國城市肇慶。(……)每個省內都有一個大都市，與省同名⁽⁶⁷⁾，按順序先設總督，他們稱之為Tutano，是全省的最高官職。省以下的一級行政單位是‘府’，這些都是非常大的城市。府下邊又設一些更小的城市，稱之為縣(Hhien Cieu)，再往下就是大量的土地、城堡、防禦工事，分佈排列得有條不紊。”利瑪竇在肇慶看到一些官員坐着華麗的官船遊西江，也有一番感受：“官員們的船是用香木做的，順着河流蜿蜒前行，船上佈置得十分舒適，在我們看來是一艘遊船。”利瑪竇通過人們的穿衣來分辨各階層人的身份：“所有的人都穿着同樣的衣服，地方行政官們的穿着在材質和顏色上稍有不同，衣服及膝，袖子寬寬的，有點像威尼斯人的打扮，儘管偶爾他們也能夠穿短款的衣服，但是去拜訪地方行政官和自己朋友，或者別人來訪時，如果沒有穿着打扮好，他們寧可躲起來，或者獸在家裡不想出門。由於身份不同，人們戴帽子的方式也是不同的，譬如說地方行政長官，文人學士，公證人，庶民，貴族的孩子和社會地位低下的孩子之間，這種差別顯而易見；然而，可以說無論怎樣的穿戴方式，看上去都非常漂亮。”利瑪竇通過與王泮等官員接觸瞭解到中國的官階級別情況：“所有官員分為九品，每個品級的官員每三年可以有晉陞的機會，另外還要根據個人的實際經驗和才能來決定。依此而上，一直到第一品，這是最高的官階，被稱作 Colao (閣老)，我們叫他為皇帝顧問，Colao 用我們的語言解釋就是國家元老。”利瑪竇還把他與總督、知府等各級官員接觸時所留意到的事情也寫在信上：“這些官員之間是隸屬關係，反正職位低的官員要向比他官階高的人行屈膝禮，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官邸，都有相稱的衣服，連戴帽的方式也不同，在出行方面，有的步行，有的在路上騎馬，有的坐在椅子上被人抬着，同樣天花板上燈的數量也是有差別的。”對於官員的出行，利瑪竇也注意到了，他在信中描述：“地方行政長官出行

時，坐在一把有六至八根柱子支撐的椅子上，甚至他所有的官員都要隨行，(……)他的手下要拿着類似樂器的器具，以及敲擊木，在這長長的隊伍中，有人負責高聲喊叫。”⁽⁶⁸⁾利瑪竇對中國及中國文化的這些認識，是他在肇慶實地觀察深入瞭解所得出的感受。

利瑪竇邊學習漢語邊着手研究用漢文去譯天主教理經文。他將天主教要義譯成了一頁條文式的教理要義，稱為〈天主十誡〉。其內容是：第一，崇拜唯一天主而不可拜別的神；第二，不可製造和敬拜偶像；第三，不可妄稱天主名字；第四，須守安息日為聖日；第五，須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殺人；第七，不可姦淫；第八，不可偷盜；第九，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第十，不可貪戀別人妻子財物。每當人們來到僊花寺的時候，利瑪竇就把這頁〈天主十誡〉條文送給他們看。一些文人學士看了這一頁〈天主十誡〉後，向利瑪竇提出想看到完整的教理要義解釋書。

1584年，利瑪竇“在家庭老師的幫助下，他們用適合百姓水平的文體，寫了一部關於基督教教義的書”⁽⁶⁹⁾。他們用了五個多月的時間，合編了這本漢譯《天主實錄》的書。這本書原是“1581年，羅明堅用拉丁文寫的一部辯教著作(Apologetics)，其中部分章節由拉丁文譯成漢語”⁽⁷⁰⁾，但譯得不準確，中國人不易看懂，利瑪竇對該書進行了重新翻譯，並進行了修訂和補充。他採用中國人發問、西方人作答的形式重新編譯，取名為“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該書是中國天主教第一本教理書籍，也就是《天主實義》一書的最早版本。該書於1584年11月29日在肇慶脫稿，“他們自己刊佈這第一卷，用他們自己的機器付印，有教養的中國人驚歎不已地接受了它。長官(王泮)特別喜愛這部書，印了許多冊，在國內廣為流傳”⁽⁷¹⁾。1584年11月30日，利瑪竇致書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道：“羅明堅神父囑咐我給您一本我們用中文編寫的《天主實錄》，托天主的聖寵的協助，今已印妥，且在中國很受歡迎。內容是一位中國教外學人詢問種種問題，一位歐洲籍神父一一回答。條理分明，文辭相

當優美，對做教友應具有的知識無不網羅其中，當然是經我們的至友潤色過。”⁽⁷²⁾利瑪竇將這本《天主實錄》分別送給肇慶的各級官員和智識階層，通過他們把該書傳到全國各地。1585年11月10日，利瑪竇在致拿坡里馬塞利神父函時就提到此事：“我們用中文撰寫而已印妥的《要理問答》，去年曾給老校長您寄了一本。（……）嶺西道尹（王泮）是我們在中國的大恩人，官位很高，其下有不少官吏。我們也送他一本，以中國習尚請他寫一篇序言加以推薦。結果他告訴我們此書不需要序言，他已看了，寫得不錯，可以在中國流傳。我們得到他的准許流傳，非常高興，這比序言對我們的信仰更有用。原來我們怕他不批准這本書。”“每當他來我們會院時，常帶一些高官大員，假使我們忘記了，他會提醒我們贈送《要理問答》給這些大員。”⁽⁷³⁾

利瑪竇的中文老師與他們相處了五個月後，這位已婚的秀才便於1584年10月21日接受了洗禮，

並起了“保祿”這個教名。利瑪竇在1584年11月30日的信中提到：“今年歸化了三位教友，其中一位是秀才，他由加布拉列神父施的洗，聖名保祿；所謂秀才，是儒家階級之一，他已返回故里。”⁽⁷⁴⁾

中文老師回故里後，利瑪竇並沒有滿足於現狀而停止學習漢語。他在1585年11月10日寫給拿坡里馬塞利神父信中說：“我仍盡力學習中國的一切，每天都有進步，目前我已能說流利的中國話，開始在聖堂裡給教友們講道，今後大門敞開，歡迎凡希望聽道理的人前來。我已能讀中國書和寫中國字了，雖然他們有好幾萬字，我要一人讀好多書，假如有人幫忙，還要讀所有的書。”⁽⁷⁵⁾經過刻苦學習，利瑪竇覺得收益極大。他很快掌握了中國的語言文字，並且“已可不用翻譯，直接和任何中國人交談，用中文書寫和誦讀”⁽⁷⁶⁾。

利瑪竇在學習漢語時，不斷地反復推敲漢文詞義，並嚴謹地漢譯用詞，力求詞義貼切。拉丁語



“天主”一詞，拉丁語原文為“Deus”，初期找不到適當的漢譯用詞，就音譯為“徒亞斯”，但中國人聽了不理解。利瑪竇與當地儒生陳理閣權商，認為中國人尊“天”為無上的主宰，用“天”來表示主宰天地萬物的神，把至高無上的主宰稱做“天帝”，便用“天主”一詞來取代“徒亞斯”，不但與原義貼切，而且易為中國人所理解和接受，從此“天主”一詞取代“徒亞斯”一詞，一直沿用至今。

“Deus”一詞⁽⁷⁷⁾當初音譯為“徒亞斯”，但中國人聽了不理解也不喜歡用，為了使該詞譯得貼切，利瑪竇帶着這個問題去請教陳理閣。

陳理閣是位本地儒生，自1582年12月與羅明堅認識後雙方便成了朋友。由於陳理閣經常聽羅明堅教誨而接受了入教，祇是羅明堅因突然被逐而未來得及洗禮。羅明堅匆匆離肇時，把常用物品和聖壇都一併託交陳理閣代管。羅明堅這次重返肇慶，陳理閣請羅明堅為他洗禮，並與好學的利瑪竇成了莫逆之交，兩人經常來往，互相學習。

利瑪竇為譯準“Deus”一詞，專程找到陳理閣，求他幫忙將拉丁語“Deus”一詞準確地譯成漢語。陳理閣便向利瑪竇提出用“天主”一詞來取代“徒亞斯”。他對利瑪竇說，中國人尊“天”為無上的主宰，用“天”來表示主宰天地萬物的神，把至高無上的主宰稱做“天帝”，而“天帝”一詞與“天主”一詞意思大致相同，中國人容易理解和接受。所以，用“天主”一詞代替“徒亞斯”一詞可能更合適。經陳理閣這樣一指點，利瑪竇也認為“天主”一詞不但與原義貼切，而且易為中國人所接受。於是，他馬上敲定用“天主”一詞取代“徒亞斯”一詞。⁽⁷⁸⁾

利瑪竇在與中國官員和士大夫交往之中，發現中國有身份的人不但有本名，而且還有字和號，本名祇用於長輩呼喚或本人自稱用，而同輩或晚輩則祇能稱呼他人的字或號，否則就是對別人不尊。因此，利瑪竇入鄉隨俗，於1585年也開始按中國人的習慣使用起字和號來，利瑪竇，字“清泰”，號“西江”，又號“大西域山人”，就是他在肇慶時開始使用的。“後來，河漕總督劉東星又給他起了個號叫‘西泰’，表示他來自遙遠的西方。”⁽⁷⁹⁾此後西方傳教士按漢人習慣為自己取字號，就是始自利瑪竇。

利瑪竇這種廢棄西名採用漢名的舉動，中國士大夫當然欣然接受，但在大部分西方人眼裡，這卻是異端行為。連一貫主張入華西士“在中國成為中國人”的范禮安也曾下令要利瑪竇恢復西名。然而，范禮安後來還是接受了，連他自己也起了一個叫“立山”的中國字號。“此後，利瑪竇在衣食住

行、言談舉止等各個方面全面進行漢化，像一個中國人一樣生活。”⁽⁸⁰⁾

僊花寺落成入居後，利瑪竇更是騰出大部分時間攻漢語這一關。為能更易於掌握漢字語音和正確貫通中西文字的字義，利瑪竇、羅明堅和一位中國學者三人開始編撰一部“葡漢對照詞表”，由利瑪竇和羅明堅分別編撰葡萄牙文詞條和漢語詞的羅馬字母拼音，中國學者幫他們注上漢語詞。他們三人抓緊時間，擠在僊花寺的房間裡埋頭編撰“葡漢對照詞表”，邁開了他們學習掌握中文的具體一步。

他們的“葡漢對照詞表”分作三欄：一欄葡語單詞，一欄羅馬字母拼音，一欄漢語詞。如羅明堅和利瑪竇分別用葡萄牙文詞條寫出“Aqua de rio”和用羅馬字母拼音寫出“ho scioj”一詞，中國學者則以毛筆寫上“河水”一個漢語詞；接着，利瑪竇他們又用葡文寫了“Aqua de poso”，用羅馬注音寫了“cin scioj”一詞，中國學者又寫上“井水”一詞；再接着，羅明堅、利瑪竇又分別寫了“Aqua de chuva”和“yu scioj”一詞，中國學者又寫上“雨水”一詞。他們通過這種平行的對比排列，使羅明堅和利瑪竇可以根據羅馬字的注音讀出中文的語音和能夠理解中西文字的字義。

三人在1585年秋開始編撰這部可稱為“葡漢辭典”的《葡漢對照詞表》，經過不懈的努力，世界上首本中西文辭典《葡漢對照詞表》，亦即是《葡漢辭典》於1586年6月在肇慶面世了。整部手稿大約收錄了六千個葡萄牙文詞條，中國學者翻譯寫出了相應的五千四百六十一個漢語詞條，還有幾十個漢語詞條由於一時還找不到恰當的漢語來翻譯這些葡萄牙文詞條，中國學者祇好暫時將它空起來，待日後再補譯之。

利瑪竇與羅明堅把這部《葡漢辭典》作為他們學習漢語的工具書。直到1588年，羅明堅為試圖安排教廷派使節往北京宮廷而回到歐洲，他把這本《葡漢辭典》也隨身帶了回去。

《葡漢辭典》是利瑪竇他們努力學習漢語的結晶，首創了用拉丁字母注漢字語音，為漢字拼音開闢了新路。羅明堅離開肇慶後，利瑪竇仍堅持勤學漢語，為其後把中國的《四書》譯成拉丁文介紹給西

方國家打下了良好的漢語基礎。由於利瑪竇把精力大多放在中國學術的研究上，所以成績非常顯著。他的漢學水平在其書信集、回憶錄以及中文著作中充份反映出來，西方人士中有如此豐富的漢文著作，利瑪竇是第一人，利瑪竇後來被人尊為西方漢學的鼻祖。

利瑪竇“孜孜不倦地學習中文，閱讀儒家經典，遵從中國民俗，做倣中國禮儀，這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擠入士人的行列”⁽⁸¹⁾。他細心地觀察和瞭解中國的風俗習慣，認真地學習中國文化，下苦功學習漢語。他閱讀了大量中國古籍，特別是學習和研究孔子學說後，知道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以佛道兩教為補充，清楚孔子這位聖賢是中國學界的泰斗，瞭解孔學在修身方面倡導仁、義、禮、智、信五常，在社會方面注重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為人處世都要遵循一定的道德倫理。儒家思想是中國官方和百姓都認可的正統大道，所以，利瑪竇此時的崇儒思想日漸形成，把自己視作一名儒士。1588年，他在用中文草擬一封羅馬教皇致中國萬曆皇帝的書函中，將羅馬教皇稱為“太僧天主教門都僧皇”，將前來中國傳教的傳教士稱為“篤實博雅儒僧”。到後來，利瑪竇還接受了瞿太素易僧服着儒服的建議⁽⁸²⁾，一切習慣禮節皆以士人為楷模，自此以“西方學者”的姿態出現，“因此博得中國士大夫的好感與崇敬。他瞭解士大夫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和影響，認識到要博得他們的信仰，自己必須首先熟悉儒學。在肇慶、韶州先後滯留十五年，埋頭鑽研儒家經典，乃至過目不忘，令士大夫們大為驚訝，尊稱他為‘西儒利氏’。”⁽⁸³⁾

平息訴訟 成功製鐘

時鐘對於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是一件新奇的玩意，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長河中，其際遇是幸運的。由於當時中國沿海不斷被海盜騷擾，中國人對外國人普遍產生敵視心理。外國傳教士被拒之中國國門之外，如何打開中國的大門，確實令他們大傷

腦筋。所以，鐘錶就充當了敲門磚的角色。1582年春，羅明堅把握了一個機會，他隨澳門主教等到肇慶公幹時，乘機向兩廣總督陳瑞獻上了包括自鳴鐘在內的貴重禮物。他於1582年12月27日再次抵肇時，又把自鳴鐘等禮物送給有關官員。的確，當時中國的漏壺計時器與西歐的時鐘相比，差別很大，時鐘成為時尚寵物。利瑪竇於1583年2月13日在澳門致羅馬總會長的信中寫道：“請您把鐘錶趕快送來，它是羅明堅神父所要求的，以便呈獻給（官吏）。”“對鐘錶談得不多，因為它是西歐式與中國的更漏大不一樣，而且分點也和我們的不一。他們所驚奇的是我們鐘錶是自動的，會報時間，有長短針把時間指出。”⁽⁸⁴⁾所以，時鐘是一些官員們夢寐以求的奇珍異品。利瑪竇初抵肇慶時，曾送給知府王泮一個自鳴鐘，儘管王泮對其愛不釋手，但他為了不玷污自己的清譽，還是及時退還給了利瑪竇。1583年12月，當羅明堅他們缺乏經費建教堂而決定回澳門籌措經費時，王泮由於“聽說澳門製造鐘錶，就要求給他定做一個，答應給以善價。”⁽⁸⁵⁾王泮託羅明堅幫他在澳門訂購一座大的自鳴鐘回來，主要是想代替府署麗譙樓的銅壺滴漏計時器，以利得到準確而便利的報時。為此，王泮還向羅明堅等提供方便，讓他們上了一艘有三十多名水手駕駛的豪華船，把他們送回澳門。

然而，當羅明堅和斐理伯回到澳門後，他們發現“為當地全部繁榮所賴的商人，尚未從日本返回”，“葡萄牙人擔心着他們的商船不平凡的拖延”⁽⁸⁶⁾，才知道澳門教會這時候經費也很困難，不能施以援手幫助他們在肇慶建教堂。

羅明堅由於“錢少到買不起長官所要的鐘，作為一種代替辦法，他們就把製鐘匠送到肇慶的長官那裡去。這個人來自印度果阿，是所謂的加那利人（Canarii），膚色深褐”⁽⁸⁷⁾，羅明堅把他送上了王泮派來的船，隨船回肇慶協助利瑪竇為王泮研製自鳴鐘，他自己則留在澳門繼續籌款。

當船隻載着這位深褐色皮膚的印度製鐘匠甘地返回肇慶後，利瑪竇馬上帶着他去拜見知府王泮。王泮對羅明堅沒有幫他訂購到自鳴鐘，很諒解，對



這位印度製鐘匠的到來表示歡迎。“他馬上把城裡兩名最好的匠人找來，協助新來的製鐘匠工作，就在教堂裡製鐘。”⁽⁸⁸⁾於是，這個跨國製鐘小組於1584年上半年就在祇建了一層的僊花寺裡開始了製鐘工作。利瑪竇在四人製鐘小組中充當了組織指導的角色，他在研製鐘的工作中大顯奇才，不但指導肇慶的兩位工匠負責鐘殼、鐘面、指標等製作，而且他還與印度製鐘匠一起負責零配件的組裝工作。利瑪竇參照西洋鐘的機械原理，先畫出鐘的樣式讓大家鑒定，再列出各個工序配件的材質選料。他們用銅來製造鐘面和指標，用鋼來打造發條作動力源，用紫檀木來做鐘殼和鐘座。除了某些技術性工作和鐘的外部形式按利瑪竇的意圖來做之外，其它均由肇慶工匠就地取材，自由發揮製作。

正當利瑪竇他們在僊花寺裡熱火朝天地製造這個時鐘的時候，有一天印度製鐘匠由於聽到屋頂有

(由上至下)1583年12月羅明堅回澳門籌款時，王泮託他幫訂購一座自鳴鐘。羅明堅由於籌不到款買鐘，便把一名印度製鐘匠送上了王泮派來的船，讓他隨船到肇慶製鐘。王泮把肇慶城兩位技術最精湛的工匠找來，命他們協助利瑪竇和印度製鐘匠共同製鐘。於是，這個跨國製鐘小組就在僊花寺內展開了緊張的研製工作。

利瑪竇和印度製鐘匠在研製自鳴鐘期間，因有小孩在崇禧塔向教堂屋頂擲石頭，印度製鐘匠把其中一個頑童抓進教堂。利瑪竇要製鐘匠立即放了小孩。擲石頭的小孩回家後，其家人便借題發揮向官府控告利瑪竇和印度鐘匠囚禁小孩，企圖把小孩賣到澳門。王泮傳訊了崇禧塔旁的幾位目擊證人，用事實證明原告捏造事實，按律對誣告者責以杖刑。他貼出佈告，告誡人們不得騷擾神父，違者嚴懲不貸。

官司風波在王泮知府的審理下平息了，利瑪竇與印度製鐘匠得以留在肇慶繼續研製時鐘。他們幾經努力，終於成功地製造出一個大鐘。這個大鐘的鐘面不用阿拉伯字刻數，而是按中國人的習慣，採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個時辰。

幾個月後，由於府署內沒有人懂得上鐘鏈及維護修理，王泮就把這個大鐘送回僊花寺。利瑪竇將這個自鳴鐘掛在僊花寺大門上，用來供市民報時和欣賞之用。

被人擲石頭的聲音，馬上跑出來看，原來是幾個小孩在崇禧塔上瞄準教堂屋頂擲石頭。印度製鐘匠怒不可遏，去驅趕這班小孩，並“抓到一個向房子扔石頭的小孩，就把他拖進屋裡，威脅說要把他送到公堂上去。聽見孩子的喊聲，附近的幾個人就跑進屋裡替犯人（按指被抓的小孩）求情；於是利瑪竇神父就命令把他放走，別多找麻煩”⁽⁸⁹⁾。這個印度製鐘匠儘管一肚子氣，但還是照辦了。

擲石頭的小孩回家後，其家人被一些人挑撥，便借題發揮向官府控告利瑪竇和印度鐘匠，想借此逼官府把利瑪竇他們從肇慶驅逐出去。

小孩的家人向王洋訴說，僊花寺內的黑鬼製鐘匠把他家小孩抓入教堂裡囚禁了三天，還喂他吃了啞藥，準備把他偷運到澳門去賣為奴隸，要求王洋知府為他們做主，替他們申冤，嚴懲這些“番鬼佬”，把他們驅逐出肇慶。

由於上訴人“把一切都說得煞是有理，尤其是他談每個細節都有人證”⁽⁹⁰⁾，知府王洋聽後，馬上讓衙差傳訊利瑪竇和印度製鐘匠到衙門候審。

利瑪竇和印度製鐘匠祇得放下製作時鐘的工作，跟着衙差到府衙大堂聽審。

府衙大堂建在與月臺相連的臺基上，尤為高大壯觀。堂中央設知府公堂，上置“明鏡高懸”匾額，公案上左邊放着紅、綠顏色的刑簽和捕簽，右邊放着文房四寶等審案所需之物。案前地上有兩塊跪石，東邊是原告的方形跪石，西邊則是被告的長方形跪石。大堂頂棚中心畫了一個大方格，內繪八卦太極圖，完全是按堪輿學說八卦方點陣圖的涵意佈局設計的；周圍還有幾十個小方格，每個小方格內分別繪有一隻朝中間圓心飛去的仙鶴。大堂左右是知府的儀仗青旗、藍傘、桐棍、肅靜牌，官銜牌、放告牌、堂鼓等物。

利瑪竇和印度製鐘匠被府衙大堂的氣氛所鎮懾，不敢擅作一聲，緊跟着傳訊他們的衙差走進了府衙大堂，跪在西邊的長方形跪石上。

知府王洋坐在大堂中央，兩邊排着衙差。跪在東邊正方形跪石上的原告陳述他們編的狀辭，利瑪竇和印度製鐘匠作了分辯。王洋聽後，向原被告雙

方作了仔細盤問，無奈雙方各執一詞，王洋為免利瑪竇當場受窘，宣佈他無罪，“把過失都歸之於那個被派遣來製造鐘錶的加那利匠人”⁽⁹¹⁾，並作出把這個印度製鐘匠遣返澳門取消製鐘的決定。

事後，王洋經調查取證，傳訊了建崇禧塔的三位目擊證人，以事實證明原告是在誣告，按律對誣告者責以杖刑，當庭宣佈撤銷驅逐印度製鐘匠的決定。利瑪竇把王洋當作大恩人，他為自己進入中國內地第一站就遇到王洋這樣的官員感到幸運。

王洋當庭告誡百姓今後不得騷擾神父，違者嚴懲不貸。他說明番僧來肇居住，是經過總督特批的，而一些人卻無中生有，捏造事實誣告於外邦客人，有違泱泱大國之禮義道德，所以才對誣告者責以杖刑，以儆效尤。他提醒百姓今後要自律，不得惹事生非，不得騷擾番僧，倘有無視法規違抗者，必嚴懲不貸。“次日，長官（王洋）在教堂大門貼出鄭重告示。這份通告說明外國人是得到總督批准在這裡居住的，然後說有些不法百姓，違反道義和常理，眾所周知地欺凌居住於此的外國人。為此，長官本人嚴行禁止今後再有人膽敢欺凌他們。”⁽⁹²⁾

印度製鐘匠的官司風波在王洋知府的審理下平息了，利瑪竇與印度製鐘匠甘地加快了研製時鐘的步伐。肇慶城的兩位五金匠根據利瑪竇的要求，用黃銅製成了鐘面和指標，用紫檀木製出了鐘殼和鐘座，並刻上中國獨特的夔龍紋。這些裝飾花紋細密繁褥，很有規律，是西洋鐘錶所沒有的。在為鐘面書寫時間數碼時，利瑪竇為了便於中國人看得懂，不用羅馬數字或阿拉伯數字書寫，卻按中國人的習慣採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個時辰書寫時刻。由於利瑪竇對這個時鐘活計的要求嚴格，無論哪個工序不符合要求或做得粗陋，他都要返工重做，所以肇慶的兩位工匠在利瑪竇一絲不苟的督製之下，在鑿、雕、嵌、鑲等工序中皆專心致志，力求每個工序都做得優秀。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這個大鐘的各種機械裝置都較精巧，內部機械結構裝有歐洲鐘錶通常所具備的走時、報時系統，整座鐘製作工藝中西合璧，頗具觀賞性和實用性。

1584年10月，利瑪竇把這個中國內陸肇慶研製出來的第一個自鳴鐘送到王泮府上。王泮對此十分喜愛，把這個大鐘置於府衙內，以代替麗譙樓上的銅壺滴漏報時。

在明代的肇慶作為府署前樓的麗譙樓上竟有一套銅壺滴漏計時器，而且這套銅壺滴漏是由四個銅質大壺製成；四個銅壺分別從高到低放在階梯式的座架上，每個壺都有蓋子，擺在最高的壺稱日壺、依次為月壺、星壺和受壺，水從這日、月、星三水壺依次下滴，進入受水壺，壺中水位上昇，木箭尺規隨之上昇，即可從尺規上觀其刻度後，則用樓中的鐘鼓來向全城的百姓報時。麗譙樓上置有一個大鐘和一個大藤鼓用以報時。大鐘有一米多高，銅質，鑄於唐乾寧末年，原置於龜頂山致道觀內，洪武一年知府步從信大修府署內這座原是供奉宋徽宗御書的樓宇後，把致道觀這個大鐘移至此樓。明成化七年，知府黃瑜對此樓進行重建後，他題匾把“御書樓”改為“麗譙樓”，並於樓上設置了這套銅壺滴漏，從此麗譙樓成為肇慶府城標準報時之地。麗譙樓上用以報時的大藤鼓誕生於成化年間，當時由於廣西僮人造反攻打肇慶府城，朝廷命趙輔將軍帶兵十六萬前往征伐。大兵追至廣西大藤峽，砍斷藤橋，把藤製成了藤鼓用作戰鼓。大軍凱旋後，把這大藤鼓置於麗譙樓上，用它來為百姓報時之用。

利瑪竇他們研製出來的這個時鐘運行了幾個月後便突然停止了。王泮急壞了，派人找來利瑪竇檢修之，又正常運轉起來。但祇正常運行了十幾天又停了，如此反復好幾次。王泮鑒於府署內沒有人懂得上鐘鏈以及進行維護修理，祇好放棄這隻大鐘，把它送回憇花寺。利瑪竇將自鳴鐘掛在憇花寺大門，用來為市民報時和供百姓欣賞。

利瑪竇等人研製的這個自鳴鐘是中國第一座國產機械鐘，而肇慶就是中國最早接觸和研製國產自鳴鐘的所在。因此，肇慶在中國計時器向近代轉化的歷史上佔了開頭的一頁。之後，肇慶和各地工匠都按利氏這個造鐘原理做造自鳴鐘。⁽⁹³⁾十八年後，利瑪竇幾經周折進京晉見萬曆帝，獻上了精致的時

鐘，並擔任御用修鐘師傅，為此利瑪竇竟被中國鐘錶行業的一些人奉為其行業神。

應邀製圖 突顯中國

利瑪竇在肇慶期間，最有影響的科學創舉就是促進了中西方在天文和地理方面的相互交流，將世界五大洲等地理名稱介紹到中國，糾正了中國古代天文地理方面的一些計算錯誤。

憇花寺的第一層在1584年上半年建成使用後，利瑪竇在憇花寺內掛了一幅歐洲地理學家繪製的西文世界地圖。這幅西文世界地圖讓肇慶人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縮影。雖然在這以前，中國人已經繪出了包括美洲大陸的世界地圖，但明政府在鄭和率船隊七下西洋後，採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遂使中國人對世界認知陌生。這幅圖使大家大開眼界。

王泮見這幅地圖上畫了很多他從未見和未聞的國家和地方。由於圖上的文字是用西文標註，王泮看不懂。他很想知道它們是些甚麼國家，利瑪竇於是告訴王泮，這是一幅由歐洲地理學家繪製的世界地圖。利瑪竇接着把這幅世界地圖上的國家和地方逐一指給王泮看，分別把這些國家的面積、人口、風俗等作了詳細的介紹。

利瑪竇這幅西文世界地圖，將西方大地球形學說介紹給肇慶的學者階層，該圖猛烈地衝擊了當時“天圓地方”觀念，引起不少人議論。有人對利瑪竇講，他們認可天圓的觀點，但地應該是方的，若地也是圓的話，那麼，地球上的人如何站立，上下又如何分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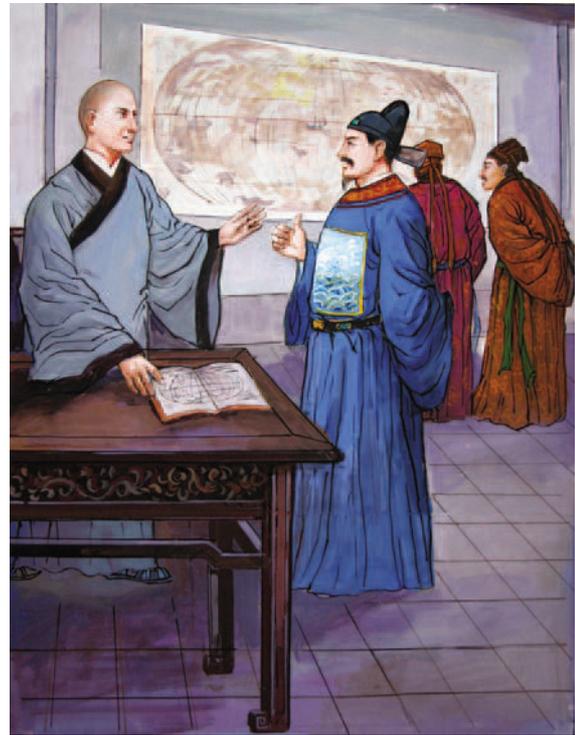
利瑪竇回答說，中國古代已有學者明確提出了地球的概念，《晉書》、《隋書》和《宋書》都有關於天如蛋白、地如蛋黃的記載。所以，天地的關係就如雞蛋黃在蛋清內，天猶如蛋清，地猶如蛋黃，圓形的蛋清不可能包裹方形的蛋黃，所以地球與天一樣是圓的。至於地球上的人如何站立與如何分辨上下的問題，就是因為地球是圓的，所以沒有上下之分，人們居住在地球的上下四周，腳站立的方向即是下，頭所朝的方向就是上。利瑪竇還用自己航



利瑪竇在櫻花寺裡掛了一幅西文世界地圖。它讓當時的中國人大開眼界，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縮影。王洋見到利瑪竇掛出的世界地圖後，就請利瑪竇為他繪製一幅世界地圖，並特別叮囑他要在地圖上用中文來標注地名。



利瑪竇於 1584 年 9 月在櫻花寺內動手繪製，他以歐洲繪製的世界地圖為藍本，但圖上的文字、公里與時間的計算及地名等都用中文標註。經過一個多月時間的繪製，中國歷史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在肇慶誕生了。當他把這件珍品送到王洋府上時，王洋看到這幅地圖把中國的位置放在地圖最東的邊緣上，就不大滿意，特請利瑪竇為他重繪一幅中國人易於接受的漢字的世界地圖。



1584年10月，利瑪竇很快就完成了這幅中文世界地圖的修改工作，他改變了16世紀歐洲人把穿過幸福島的零度經線置在地圖中央、把中國置於地圖右側邊緣的做法，將零度經線從地圖的中間移到了左邊，使中國版圖出現在地圖的中央，此即《山海輿地圖》。這幅中文世界地圖使王洋非常滿意，他出資刻印了十多張，當作珍貴禮品送給當地要人和各地有名望的朋友。



利瑪竇在櫻花寺落成後就在寺內闢了一間大室作為展出圖書的場所，將從歐洲帶來的一批西文圖書公開展出。這些書除了教會的經典外，大部分是有關天文、數學、地理、機械、水利的書，還有城市建築、美術畫冊等。利瑪竇對前來看書的讀者不分貴賤親自引導他們觀看。

海的經歷作論據，陳述他從歐洲航海到中國，繞地球航行，始終見到天在上，而未見過天在下。他以此來向大家解釋清楚地球是圓的。利瑪竇這些有依有據的地圓學說，使肇慶一些學者明白並逐漸承認和接受地球與天一樣是圓的觀點。

的確，中國古代對“天圓地方”一直有着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元史·天文志》中有記載，當時中國已有人製造出地球儀，該地球儀上“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地，其色白”。東漢時著名學者張衡在其著《靈憲》書中也明確提出了“赤道”的概念。古代一些學者還提出了南、北極圈的概念，這兩個概念的名稱分別為“上規”和“下規”。

士大夫們與利瑪竇爭辯“天圓地方”的話題對於王泮來說，一點興趣都沒有。他感興趣的是那幅掛在牆上的世界地圖。那些讀書人也對這幅

“用歐洲文字標註的世界全圖感興趣。有學識的中國人嘖嘖稱羨它；當他們得知它是整個世界的全圖和說明時，他們很願意看到一幅用中文標註的同樣的圖。”⁽⁹⁴⁾

於是，王泮開口向利瑪竇提出，請利瑪竇幫他繪製一幅用中文來標註的世界地圖。利瑪竇清楚地知道，繪製一幅被中國官員和士大夫所重視的地圖，不僅可以使他個人贏得聲望，而且還可以為他以後的活動創造良好條件。他爽快地答應了王泮的請求。

“利瑪竇受過很好的數學訓練，他在羅馬攻讀了幾年數學，得到當時的科學博士兼數學大師丁先生（Christophorus Clavius）的指導。應長官（王泮）之請，他馬上進行這項工作”⁽⁹⁵⁾，於1584年9月在櫻花寺裡開始動手繪製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他製作這幅圖主要是以隨身所帶的多種西文書籍圖冊為依據，其次是以當時中國每個省的地圖作參考的。他



不少讀書人從利瑪竇的城市建築美術畫冊中直觀地看到了歐洲的城市、宮殿、廟宇、拱門、橋樑等建築，對西方的物質文明感到驚訝，對西文圖書紙質堅韌潔白光滑表示贊歎，有云“其紙白色如繭，薄而堅好，兩面皆字，不相映奪，受墨不滲，着水不濡，甚異之。”利瑪竇在櫻花寺圖書館的油畫及有關美術書，讓當時的中國人第一次見到了中國畫以外的畫種，眼界大開。利瑪竇在肇慶開闢了油畫傳入中國的途徑，引發了西方油畫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他在櫻花寺展出天球儀、地球儀、象限儀、光譜儀、渾儀、三稜鏡等儀器，並以掛圖形式推介西方科技，使人耳目一新。他還在櫻花寺外用儀器測量崇禧塔的高度、水井的深度和道路的長度，當其實驗被證實時，令大家消除了對那些天文儀器真實性的懷疑。

在 1585 年致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先生的函說：“中國地圖是畫在平板上的，按我們西洋的方式，每省各有地圖，因為尚未排好次序；但希望天主保佑，很快地能將它們寄給閣下。各處都有記載，並可看到各省和其中的城市，非常美觀悅目。”⁽⁹⁶⁾ 利瑪竇這幅圖雖主要以歐洲繪製的世界地圖為藍本，但圖上的文字、公里與時間的計算及地名等卻全部採用了中文來標註。由於中文字體所佔的空間比西文大，繪出來的中文世界地圖比原來的西文世界地圖篇幅大了很多。

利瑪竇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於 1584 年 10 月把這幅中文世界地圖繪製完畢，剛好這時自鳴鐘

也研製成功，利瑪竇把這兩件禮物送到王洋府上。王洋欣喜若狂，急不可待地打開這幅中文世界地圖認真細看。他對這幅中文標註的世界地圖大體是滿意的，但當他看到這幅地圖把中國的位置放在地圖最東的邊緣上，便有些不大高興。他認為，既然地為圓球，而球體的本性就是無頭無尾的，站在西方人的角度上，自然是以西方為中心，但站在中國人的位置上，則應以中國為中心。所以，王洋請利瑪竇幫他重繪一幅中國人易於接受的世界地圖。

經王洋這麼一說，利瑪竇馬上表示樂意按王洋的意圖重繪一幅中國人易於接受的世界地圖。於

是，他從府署回到僊花寺後，日以繼夜地重新修改繪製一幅中國人易於接受的中文世界地圖。這次利瑪竇改變了16世紀歐洲人把穿過幸福島的零度經線置在地圖中央把中國置於地圖右側邊緣的做法，將零度經線從地圖的中間移到了左邊，這樣，亞非歐三個洲就被移到了地圖的左側，中國正好出現在地圖的中央。“他抹去了福島的第一條子午線，在地圖兩邊各留下一道邊，使中國正好出現在中央，這更符合他們的想法，使得他們十分高興而滿意。”⁽⁹⁷⁾利瑪竇不但苦心孤詣地移動了中國在地圖上的位置，而且，他所繪的中國部分比歐洲的原圖更為精確詳細。利瑪竇為該圖取名為“山海輿地圖”。1584年10月，利瑪竇完成了這幅中文世界地圖的繪製工作。他把這幅中文世界地圖送給了知府王洋，令王洋十分滿意。他除了口頭向利瑪竇致謝外，還饋贈了一些禮物給利瑪竇。從此，王洋對利瑪竇這位學者型的僧人產生了崇敬之情，對利瑪竇的支持也日漸提昇。

這幅名為“山海輿地圖”的中文世界地圖，受到王洋等士大夫階層的極力推崇。王洋經常把它拿出來給同僚和士大夫們觀看，讓大家對世界有一個新的認識。他簡直就是愛不釋手，很希望能夠多得到幾幅這樣的地圖，於是他自己出資將〈山海輿地圖〉刻版印刷了十多張。

利瑪竇把“這份地理研究，經常加以校訂、改善和重印，進入了長官和總督的衙門，大受稱贊”⁽⁹⁸⁾。利瑪竇精心繪製的這幅地圖，也是有其意圖的，用他的話來說，“他們在地圖上看到歐洲和中國之間隔着幾乎無數的海陸地帶，這種認識減輕了我們的到來所造成的恐懼。為甚麼要害怕一個天生離他們那樣遙遠的民族呢，如果所有中國人都知道這一距離遙遠的地理事實，這種知識會有助於排除在全國傳佈福音的巨大障礙”⁽⁹⁹⁾。利瑪竇在1585年10月20日致羅馬總會長的書信中彙報道：“我給了三張相似的世界地圖，全部用中文講解；一張贈送給王洋，一張贈給廣東省兵備道，一張贈給一位文人。目前，我正在繪另外一張，要盡力繪詳細些，可惜此處沒有書籍可供參考。”⁽¹⁰⁰⁾

這幅世界地圖由王洋出資刊印後，王洋把它當作珍貴禮物送給當地要人和各地有地位的朋友，其中一幅為南雄同知王應麟所得。王應麟於1593年陞任鎮江知府後，將〈山海輿地圖〉刻版印刷轉送給他的上司應天巡撫趙可懷。趙可懷對這幅〈山海輿地圖〉珍愛有加，把它摹刻在蘇州城西南胥門外驛站的一塊石碑上，⁽¹⁰¹⁾與〈山海輿地圖〉刻在一起的還有趙可懷親自撰寫的贊美序文，但趙可懷沒有把這幅圖的繪製者利瑪竇的名字一同刻上。趙可懷把〈山海輿地圖〉刻在石碑上後，便吩咐對其進行拓印，並把這些拓印本作為珍貴的禮物送給同僚和朋友們。1598年，趙可懷把一份拓印本送給禮部尚書王忠銘。這幅圖經王洋的刊刻傳播，在全國影響很大，利瑪竇因此名聲鵲起。1584年11月30日利瑪竇將該地圖一幅寄回羅馬，並將此版的兩幅地圖送給范禮安。范禮安於1584年12月28日把這兩幅圖寄回歐洲。利瑪竇在1584年11月30日致羅馬總會長的信中寫道：“我們同時把‘十誡、天主經、聖母經’的中文譯文寄給您；除此外尚有一張地圖，是以我們的樣式出版的；但是上面的文字、公里與時間的計算以及地名學，則以中文寫出。我們把它送給肇慶知府王洋，他立刻要人印刷出來。雖然其中不無錯誤，部分原因在我，首先因我不曾盡心繪製，同時我也沒想到這麼快便印妥了；部分是印刷上的手民之誤。但我仍認為您看到上面的中文註解而會感到，您應知道這張地圖在中國是多麼受到重視，還是知府本人在他官邸中親自督印的。但他不願賣給任何人，而祇把它當作重禮，贈送給中國有地位的人。”⁽¹⁰²⁾

利瑪竇繪製的這幅〈山海輿地圖〉，在中國地圖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標誌着中國近代製圖學的開端。這幅圖深受當時官員和士大夫階層的喜愛，在他們的眼裡，這幅圖就像一個別有洞天的精彩世界，使他們第一次從圖上看到了外面的世界，開闊了視野。它像一陣強勁的風，猛烈地煽動中國學者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熱情，使他們中間一些人後來成為了中國第一代致力於西學的學者。

展出圖籍 傳播科技

利瑪竇在僊花寺裡展出西文書籍、油畫，傳播西方的天文、地理、數學等科學技術知識，給了中國人一個認識西方文明學習西方先進科技的平臺。

1584年，僊花寺落成後，利瑪竇就在僊花寺裡闢了一間室作為展出西文圖書的場所，這實際上就是中國第一所“圖書館”的雛形。⁽¹⁰³⁾利瑪竇將他從歐洲帶來的一批有關天文、數學、地理、機械、水利的書，還有城市建築美術等畫冊在這個小型“圖書館”裡面展出，公開讓人觀看。

當地不少讀書人在利瑪竇展出的這些科技書籍裡認識西方的科技，儘管他們對那些西洋文字一點也看不懂，但他們從一些城市建築美術畫冊中直觀地看到了歐洲的城市、宮殿、教堂、拱門、橋梁等建築，不禁對西方的物質文明感到驚訝。對前來看書的人，不論是官員、文人，還是普通百姓，利瑪竇不分貴賤地引導他們觀看，耐心地為讀者講解。他打開一些畫冊，向讀者講解書中的圖文。當時肇慶的讀者對書中西方國家的這些奇異建築及其風光產生了濃厚興趣。尤其是《歐幾里德幾何學》一書，更為知識界所青睞。該書是一部數學經典之作，利

瑪竇率先把它推介給肇慶的智識階層，使它首先在肇慶傳播。

不少讀者對西文圖書紙質潔白光滑、封面裝幀精緻表示驚奇，稱贊“其紙白色如繭，薄而堅好，兩面皆字，不相映奪，受墨不滲，着水不濡”，故“甚異之”。當時，由於中國的線裝書多是用活字工藝印在宣紙或玉扣紙上，印刷時油墨祇能印在單面的紙上，不能作雙面印刷，而且這些線裝書的紙質薄易發黃，與歐洲書籍的紙質和裝幀相比有很大差別，利瑪竇展出的這些科技書籍，不但讓讀者見識到西方科技，而且讓他們見識了西方的造紙和印刷術。

利瑪竇在僊花寺圖書館內展出的油畫及其有關美術書籍也讓讀者着迷，讓當時的肇慶人第一次見到了中國畫之外的畫種，肇慶的智識階層發現這些筆致精細的彩繪畫，都覺得很新奇。利瑪竇向他們解釋這種畫種叫做油畫(oil painting)，是用透明的植物油調和顏料，在亞麻布、紙板或木板上進行製作的，起源於歐洲。⁽¹⁰⁴⁾由於油畫的作畫使用松節油和亞麻仁油等，故畫面所附着的顏料有較高的強度，畫面乾燥後能長期保持光澤，所以，這種繪畫技術很快就在歐洲其他國家廣為傳播。經過利瑪竇



利瑪竇在肇慶活動場所分佈示意圖



兩廣總督府於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由廣西梧州移駐肇慶，為兩廣最高行政及軍事機構，政治地位顯要。圖為兩廣總督府遺址（今市政府大院）。



崇禧塔於明萬曆十年（1582）九月由肇慶知府王泮興建，萬曆十三年（1585）四月竣工。塔高五十七點五米，外九層，內十七層。利瑪竇曾登臨過該塔。圖為崇禧塔。



利瑪竇抵肇第一個落腳點在天寧寺旁邊的一所寬敞的房屋，與一名叫陳理閣的儒生作鄰居。圖為天寧寺遺址旁的房屋。



僊花寺位於崇禧塔東側。利瑪竇於1583年底興建，1584年上半年建成第一層啟用，1585年11月24日完成第二層。這是中國內陸第一座歐式風格的建築物。圖為僊花寺遺址。



山陰王公生祠位於崇禧塔西側，始建於明萬曆十五年（1587）。該祠為磚木結構，單簷硬山頂，石質柱礎，木質圓柱。利瑪竇曾到該祠活動。



古渡頭遺址位於西江北岸。1583年9月10日利瑪竇乘船抵達肇慶，就是從這個古渡頭上岸，開始他的中國內陸之旅。圖為肇慶古渡頭遺址。

的熱情講解，讀者們一邊觀看，一邊聽講，眼界大開，特別是對一幅掛在僊花寺聖堂裡的〈聖母抱小耶穌〉油畫，更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少百姓看到這幅栩栩如生的油畫後，都認為是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顯身於畫中，把她當成“送子觀音”來拜，每天到僊花寺向油畫燒香跪拜。⁽¹⁰⁵⁾利瑪竇為了避免張冠李戴，便更換上了一幅耶穌油畫像，把聖母油畫像移掛到小堂裡。

利瑪竇在僊花寺展出的那些美術畫冊和掛在那裡的油畫，將西方油畫的繪畫技法從這樣一條途徑傳入中國，從而引發了西方油畫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

利瑪竇在僊花寺展出天球儀、地球儀、象限儀、光譜儀、渾儀、三稜鏡等儀器，也令當地人着迷。當時明代兩京雖已存在各種天文儀器，但廣大群眾接觸不到，肇慶百姓更是聞所未聞，故使不少人對這些天文儀器抱有懷疑態度。利瑪竇向大家逐一介紹這些天文儀器的功能和使用方法，還在僊花寺外用儀器測量崇禧塔的高度、水井的深度和道路的長度；當實驗被證實時，大家便逐步消除了對這些天文儀器的懷疑，並對天球儀這種儀器有了初步的認識和瞭解，知道天球儀是用於表現星和星座位置，以及用來演示天體的周日運動。

利瑪竇初抵肇慶時，發現中國人對日月蝕現象異乎尋常地關心，對日月蝕的預報也格外重視，所以，利瑪竇特別關注中國人在日月蝕觀測方面的天文實踐活動。當他見到中國人於1583年11月20日和1584年5月24日兩次準確地預報了日蝕時，不禁大加稱贊，寫了一封信回歐洲道：“他們計算出日、月蝕非常清楚而準確，所用方法卻與我們不同，還有在算學上，以及在一切藝術和機械學上，真令人驚奇。這些人從來沒有和歐洲交往過，卻完全由自己的經驗而獲得如此成就，一如我們與全世界交往所有的成績不相上下。”⁽¹⁰⁶⁾利瑪竇不但關注中國人的日月蝕觀測活動，自己也積極進行了日月蝕的觀測活動。他經常在僊花寺陽臺上觀測天象變化，準確地預報過日月蝕。他在1584年9月13日寫給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的信中寫道：“我曾清楚的觀察過兩次月蝕，一次在澳門，很仔細地觀察，

而另一次在肇慶，它在澳門北方，差不多在一百廿四度左右。其南方海岸在廿至廿八度之間，從北極算起，在中國北部為韃靼區，差不多離開北極有四十四、五度；當我旅行時，由計算日程而算出來的，它的距離是用意大利的尺寸計算出來的。”⁽¹⁰⁷⁾然而，當時肇慶的百姓對宇宙自然現象卻處於無知狀態，認為日蝕和月蝕是災難的凶兆。鑒此，利瑪竇就用科學的道理來向大家解釋了日月如何運行，月圓月虧和日蝕月蝕如何發生，宇宙星球如何運動等道理，令聽眾都感到非常新奇。利瑪竇因此博取了當地不少人的好感，他的聲望在學者中驟然上昇。

利瑪竇在“地圖獲得巨大的勝利”後就“開始用銅和鐵製作天球儀和地球儀，用以表明天文並指出地球的形狀”⁽¹⁰⁸⁾。他在地球儀上按子午線、緯線和度數來劃分地球的表面，標明赤道、熱帶及兩極，把地球分為五個地帶。利瑪竇所製作的地球儀與繪製的地圖一樣，同屬中國早期地圖繪製學的重要物件。

利瑪竇還應一些官員和智識界人士的邀請，在僊花寺製作了一些日晷儀，並教他們學習製作日晷，解釋其原理和操作方法。這些日晷，實際上就是一種利用日影來測時刻的計時器，它通常是用銅製作指標，用石製作圓盤，晷針上端指向北天極，下端指向南天極，晷面刻有十二個大格，每個大格代表兩個小時。當太陽光照在日晷上時，晷針的影子就投向晷面。太陽由東向西移動，投向晷面的晷針影子也慢慢由西向東移動，移動着的晷針影子就像現代鐘錶的指標，晷面就是鐘錶的表面，以此來顯示時刻。當時中國各地的譙樓和鐘鼓樓就是古代授時的建築，而譙樓上用作計時的工具就是日晷和漏刻。利瑪竇為了便於中國人使用，採用了中國的十二時辰計時法，在日晷上標明黃道十二宮獸象。

利瑪竇別出心裁地將其製作的天文儀器當作公關的奇器，送給與其交往的士大夫和各級官員，“把它們送給各個友好官員，包括總督在內。當把這些不同的器械展覽出來，把它們的目的解說清楚，指出太陽的位置、星球的軌道和地球的中心位置，這時它們的設計者和製作者就被看成是世界上的大天文學家”⁽¹⁰⁹⁾。

【註】

- (1) 瑪切拉塔城所在地在古羅馬時代曾是一座城堡，後人們在廢了的城堡中重建了瑪切拉塔城。“瑪切拉塔”意大利語是廢墟 (macerie) 的意思。
- (2) 耶穌會為天主教的主要修會之一，該會產生的背景是因為依納爵·羅耀拉(西班牙人)等七人反對16世紀歐洲爆發的宗教改革運動而設。1534年他們在巴黎發願，構成了耶穌會的雛形。1540年9月27日，羅耀拉向教宗保祿三世提出建立新修會的請求被批准，羅耀拉當選耶穌會的首任總會長。
- (3) 利奇(Ricci)家族是瑪切拉塔城裡的貴族，這族人在三個世紀前就受敕封。
- (4) 依納爵·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年出身於西班牙貴族家庭。
- (5) 羅馬學院由羅耀拉創建於1551年，該校匯集了眾多優秀教師，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科學研究中心。
- (6) 耶穌會要求每位會士系統地學習哲學、法學、神學、文學、政治、醫學、自然科學和各種語言，並通過嚴格的考試，目的是使其成員能在社會發揮作用。利瑪竇擁有淵博的知識，是得益於規範的教育制度。
- (7) 克拉委奧1538年出生於德國，是當時非常著名的數學家 and 天文學家。羅馬教皇於1582年頒佈曆法改革的詔就是由他主持修訂的。他用拉丁文校印出版了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德的名著《幾何學》，並對該書做了分析。“clavius”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釘狀”，因此利瑪竇後來在中國稱他為“丁先生”。
- (8) 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意大利人。他曾是一名民法博士，在教皇保祿二世的宮廷裡服務。他27歲時放棄這份職業，加入耶穌會，成為一名神父。先後擔任羅馬耶穌會新會員講習的代理主持、瑪切拉塔耶穌會學院院長。
- (9) 當時的“東印度”，在歐洲人的地理概念上也包括了中國和日本。
- (10) 明代中葉以前，澳門這一地名尚未出現，半島的北部名叫望下或旺廈；南部因很多地區的海水較淺，產蠔甚多，不少地名都帶“濠”字，而這一半島的南部有南北兩個海灣，“規圓如鏡”，故被命名為“濠鏡”。
- (11) 由於一夥西班牙人在耶穌會士桑切斯(Alonso Sanchez)的引領下於1582年4月2日在福建登陸，5月2日來到廣東。中國官員不安，兩廣總督陳瑞傳喚澳門主教 Leonardo de Sá 與澳門葡萄牙長官米蘭達(Aires Gonçalves de Miranda)到肇慶總督官衙解釋葡萄牙人在澳門行使統治權的法律基礎。范禮安則派羅明堅隨澳門主教一起抵肇履行該項使命。
- (12) 陳瑞是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曾在朝廷任御史等職，任過湖廣巡撫、南京右都御史、刑部尚書。他來肇慶任兩廣總督時帶兵部尚書銜。
- (13)(14)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頁151。
- (15)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版，頁40。
- (16)(17)(19)(20)(21)(22)(23)(24)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頁151；頁152；頁154；頁155；頁155；頁156；頁156-157。
- (18) 巴範濟回澳門後奉范禮安命去了日本。幾年後他返回澳門再度組織赴中國傳教時，沒幾個月便去世了。
- (25) 王泮，浙江山陰(今紹興市)人，進士出身，萬曆八年(1580)任肇慶知府，十二年(1584)陞任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兵備道、分巡嶺西道，仍駐肇慶；十六年(1588)調湖廣布政使司參議(湖廣參政)後陞任布政使。他在肇慶八年，因政績顯著故得建生祠紀念並載入地方誌“名宦”篇。
- (26) 肇慶以前叫端州，宋代時，以端州為封地的端王趙佶做了皇帝，稱宋徽宗。他在重和元年(1110)把端州陞格為興慶軍節度，同年興慶軍又陞格為興慶府，第二年宋徽宗賜名肇慶府，宋徽宗書寫“肇慶府”三個大字賜給肇慶，肇慶知府古革為謝主龍恩，讓百官瞻仰皇帝御書墨寶，在府衙前建此高樓供奉，樓建成後取名為“御書樓”。
- (27) 補子始於明朝，清代沿用，祇作了一些更換。文官繡鳥，武官繡獸：一品文官繡鶴，武官繡麒麟；二品文官繡錦雞，武官繡獅；三品文官繡孔雀，武官繡豹；四品文官繡雁，武官繡虎；五品文官繡白鸞，武官繡熊；六品文官繡鷺鷥，武官繡彪；七品文官繡鸛，武官繡犀牛。
- (28)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版，頁33。
- (29)(30)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1版，頁160。
- (31) 明萬曆十五年(1587)，肇慶人在崇禧塔西側修建了“山陰王公生祠”以紀念王泮。
- (32)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1版，頁161。
- (33) 該信是利瑪竇於1583年在肇慶時寫的，故“這幾個城市”應指是他僅到過的香山、廣州和肇慶。
- (34) 中國的塔層數一般為單數，印度的相輪為雙數。“陰陽五行”學說雙數為陰、單數為陽，所以中國的塔不採用雙數，而採用了單數。
- (35)(36)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頁161。
- (37) 喬納森·斯彭斯著，王改華譯：《利瑪竇傳》(內部發行)，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頁243。
- (38) 譚論，高要籍人，嘉靖三十七年舉人，曾任南直隸鳳陽府五河縣(今安徽省)知縣，參與纂修《肇慶府志》，擔任過肇慶府學、梅庵等建築的修建。《利瑪竇中國劄記》稱他為“譚君論”，其實“君”為當時之兼稱，利瑪竇將“譚君”當作名字“君論”。譚論曾主動為耶穌會排憂解難。羅明堅得以前往廣西和湘南邊境，就是譚論獻議，並向王泮說項，羅明堅才獲准成行的。
- (39) 滿刺加是當時中國人對馬六甲的譯音。
- (40) 佛朗機，是當時對“法蘭克”(Frank)一詞的譯音。“法蘭

- 克”是公元6世紀征服法蘭西地方的一個日爾曼部落集團。東方人泛稱其為“佛朗機”。
-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割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頁165；頁166；頁169；頁166；頁196；頁166；頁166；頁174；頁172。
- (50) 西方淨土(xi fang jing tu)，是佛教語指西方極樂世界。“淨土”(jingtu)，佛教指沒有塵世庸俗氣的清淨世界。現不少人把王泮為利瑪竇肇慶教堂題寫的“西來淨土”寫為“西來淨土”，並解釋為“從西方來的淨土”。在藏在耶穌會意大利羅馬檔案館的肇慶教堂題字刻文裡，卻清楚地用中文寫著“西來淨土”，下方注音為“su lai cin tu”。
- (51) 現一提起“櫻花寺”，大家都清楚是指利瑪竇在肇慶建的中國內地第一座天主教堂。
- (52) (53) (54)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割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頁167；頁168；頁169。
- (55) 葡萄牙商人以澳門為中心，一般在每年的5月至6月乘坐由中日貿易船隊司令指揮的大帆船，順着夏季的西南季風自果阿出航，抵達澳門的次年初夏再乘着季風東渡日本長崎貿易，第三年秋天才在澳門乘着秋季的季風返回印度。
- (56) (57)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版，頁84；頁76。
- (58)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割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頁182。
- (59) 櫻花寺西側的崇禧塔自1582年9月開工建設後，歷二年零五個月，於1585年4月竣工。
- (60) (61)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版，頁84；頁76。
- (62)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割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頁182。
- (63) (64)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版，頁31-32。
- (65)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割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頁171。
- (66)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版，頁48。
- (67) 這與事實不符，說明利瑪竇初抵肇慶期間(1583)，對中文的把握和對中國國情的瞭解尚未能很準確。
- (68) 利瑪竇這篇用意大利文寫的“中國紀事”的原件現藏於羅馬耶穌會。澳門利氏學社的趙神父(法國籍)有此件之影印本。2006年筆者與編寫《東土西儒》一書的成員赴澳門收集資料時，得到此件，於肇慶請人翻譯出中文文件。
- (69)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割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頁171。
- (70) 林金水、鄒萍：《泰西儒士利瑪竇》，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1月第一版，頁118。
- (71)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割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頁172。
- (72) (73) (74) (75) (76)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版，頁59；頁75；頁61；頁77。
- (77) 這個詞是天主教最重要的中心詞彙，指天主教是萬物之主、唯一真神之稱謂。
- (78) 利瑪竇用“天主”一詞來取代“徒亞斯”一詞後，“天主教”這一稱呼也就一直沿用至今。
- (79) (80) (81) 林金水、鄒萍：《泰西儒士利瑪竇》，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1月第一版，頁241；頁241；頁142。
- (82) 利瑪竇致函范禮安要求把身份由僧人改為儒者，得到同意後，於韶州脫去僧衣，留鬚蓄髮，改穿儒服。
- (83) 樊樹志：《晚明史》上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頁158。
- (84)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版，頁40。
-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割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頁173；頁174；頁175-176；頁177；頁179。
- (93) 製鐘這個行業直到清康熙中期，才在廣州開始出現鐘錶製造業，於乾隆時已成規模。
- (94) (95)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割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頁179；頁180。
- (96)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版，頁47。
- (97) (98) (99)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割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頁180-181。
- (100)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版，頁70。
- (101) 《蘇州府志》記載該圖名為“山海輿地圖”，所以，利瑪竇於1584年在肇慶繪印的世界地圖的中文名稱當為“山海輿地圖”。
- (102)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版，頁60。
- (103) “圖書館”清末才在中國出現，但當時櫻花寺的這個小型圖書室不但有各種藏書，而且還公開讓人去閱讀，多少具備了圖書館的一些功能，故可稱得上是“中國第一所圖書館之雛形”。
- (104) 油畫的前身是15世紀以前歐洲的蛋彩畫。一般認為，15世紀初期的尼德蘭畫家凡·愛克兄弟是油畫技法的奠基人。他們在前人嘗試用油溶解顏料的基礎上，以亞麻油和核桃油為媒介作畫。這樣，在作畫時運筆流暢並能反復覆蓋修改，乾透後的顏料附着力強，色澤鮮豔，不易剝落和褪色。
- (105) 當時的中國人不知道聖母是甚麼人，加上又從來未見過油畫這種畫種，很多人都誤以為畫中人就是“送子觀音”，就如早期來中國的歐洲人把手抱嬰兒的“送子觀音”當作聖母瑪麗亞抱小耶穌一樣。
- (106) (107)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冊，臺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版，頁52；頁46。
- (108) (109) 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割記》，中華書局1983年3月第一版，頁182；頁182-183。

【附一】

利瑪竇生平大事一覽表

年 齡	時 間	大 事 摘 要
0歲	1552年10月6日	在意大利中部的瑪切拉塔市出生
9歲	1561年	在瑪切拉塔市耶穌會學校上小學
16歲	1568年	中學畢業後在羅馬日爾曼法學院讀法律
19歲	1571年8月15日	加入耶穌會
20歲	1572年9月	在耶穌會創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師從數學家克拉委奧
25歲	1577年春	耶穌會總會長正式派利瑪竇赴印度傳教
26歲	1578年3月29日 9月13日	離開里斯本乘聖路易斯號帆船前往亞洲。 抵達印度果阿，學習神學，教拉丁語與希臘語。
28歲	1580年7月25日	在印度柯枝晉陞為司鐸
30歲	1582年4月26日 8月7日	乘船離開印度果阿 抵達澳門，學習漢語為進入中國內地做準備。
31歲	1583年9月10日 9月15日 下半年 12月	抵達肇慶獲准居留 得王泮支持在崇禧塔北側劃地建教堂 與譚諭協商將建教堂之地皮換至崇禧塔東側 肇慶教堂建設資金缺乏中途停工，賣三稜鏡籌款續建，羅明堅回澳門籌款。
32歲	1584年上半年 9月 9月 10月 11月29日 同年	肇慶教堂第一層竣工使用，取名“聖童貞院”，王泮為教堂題匾“僊花寺”。 在肇慶繪製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 在肇慶研製出中國內陸第一座自鳴鐘 修改中文世界地圖，把中國的位置移到地圖中央，取名“山海輿地圖”。 與福建籍老師合譯《天主實錄》並付印 與陳理閣敲定用“天主”取代“徒亞斯”一詞
33歲	1585年5月 秋 11月24日	羅明堅籌得經費回肇慶 開始與羅明堅編撰《葡漢辭典》 完成僊花寺第二層建築，整座建築為歐式風格。
34歲	1586年春 6月	收容救濟因西江洪水泛濫而寄寓僊花寺的災民 《葡漢辭典》面世
36歲	1588年1月 8月至9月 12月	羅明堅調離，利瑪竇獨力支撐肇慶教堂的工作。 被控與澳葡人勾結案解決，在肇居留證持有人由羅明堅改為利瑪竇。 劉繼文諭示徹查奸細案，被令遣返澳門或移居別處。
37歲	1589年 8月 8月15日 8月24日 8月28日 10月4日	返澳請示，范禮安同意將駐地移往別處；回肇後與瞿太素相識。 劉繼文同意其移居韶州，付六十兩銀將僊花寺充公。 乘船離肇 抵達韶州南華寺，不願居於寺中。 暫居韶州武水西岸光孝寺 在韶州光孝寺附近得地建中式居所和聖堂
38歲	1590年	韶州居所和聖堂建設完工
40歲	1592年2月18日 7月	應瞿太素之邀到南雄，結識南雄同知王應麟。 韶州教堂被襲，到肇慶聽候復審；其間與湯顯祖奇遇，湯顯祖賦詩紀此事。
41歲	1593年秋	在韶州與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初次相會

43歲	1595年5月 5月31日 6月17日 6月28日 7月 8月 10月 同年	跟隨兵部侍郎石星離開韶州北上 抵南京請求定居未獲准 從南京乘船轉至南昌，28日抵達南昌。 在南昌知府衙門附近購得一所住宅 在南昌顯露過目成誦本領，江西巡撫陸萬垓允其居留南昌。 拜謁建安王、樂安王等皇親 著《交友論》 初著《西國記法》
44歲	1596年 9月22日 10月13日	《天主實義》脫稿 在南昌準確預測日食時間 印製《坤輿萬國全圖》
45歲	1597年8月	被任命為耶穌會中國傳教區會長
46歲	1598年6月25日 9月7日 12月	離開南昌隨王弘誨首次晉京，途抵南京結識應天巡撫趙可懷。 首次抵京未獲准在京定居 離開北京
47歲	1599年陰曆年 1599年2月6日 2月10日 同年 同年	過鎮江在知府王應麟府邸過年，與許多高人雅士相會。 乘王應麟知府官船去南京，寄寓南京承恩寺。 在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府邸歡度元宵節，與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相識。 隨王弘誨到南京天壇觀看祭孔典禮前一天的預習 官費刊印《輿地圖》，廣為散佈，並被翻印。
48歲	1600年年初 5月 7月3日 10月底	在南京與徐光啟相遇一見如故 乘太監官舟第二次北上晉京，在濟寧會晤李贄。 抵臨清受阻於稅監馬堂，18日得繼續啟程往天津，23日抵天津。 遇太監馬堂勒索，逼交貢品寶物，所帶行李物品遭搜查。
49歲	1601年1月24日 1月25日 2月 2月 5月28日 5月28日後	抵北京下榻南城外 進呈自鳴鐘、西洋琴、《萬國圖志》等貢品，得萬曆帝信任。 奉召入宮調整自鳴鐘，在宮傳授時鐘操作和保養方法。 編寫《西琴八曲》 獲皇帝准許在京居住；遷出四夷館，租賃民房居住。 到獄中探望馮應京成為莫逆之交
50歲	1602年8月	出版再次修訂的中文世界地圖
51歲	1603年	出版《天主實義》漢語論著
53歲	1605年7月 1605年9月	致函總會長彙報已力辭皇帝封官得保官員津貼 始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
54歲	1606年8月27日 同年	在北京宣武門附近購得一所面積寬闊有大小房子四十多間的大宅，是日遷入居住。 著《畸人十篇》，手稿被士大夫們所傳抄。
55歲	1607年 初春	與李之藻合譯出版《乾坤體義》 與徐光啟合譯完《幾何原本》前六卷出版
56歲	1607年	刊印出版《畸人十篇》。
57歲	1608年 1609年8月22日 同年 9月	撰寫《天主教傳入中國史》（中譯本為《利瑪竇中國劄記》） 致函回歐洲中談到中國皇帝命其獻十二幅圖印《坤輿萬國全圖》 獲准在太監和官員陪同到城牆上行走觀光 用意大利語開始寫《天主教傳入中國史》（中譯本為《利瑪竇中國劄記》）
58歲	1610年3月 5月3日 5月11日	在北京宣武門大街建兩層歐式風格教堂 病臥不起 晚六時在住所去世，萬曆帝御賜北京城外二里溝“滕公柵欄”作墓地。

【附二】

利瑪竇中文著作一覽表

著作	大事摘要
《交友論》	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利瑪竇在與建安王朱多燼交往時，被詢問到西方人對友誼的看法。於是利瑪竇把歐洲名人關於友誼的格言整理譯成中文。編纂成《交友論》小冊子。該書雖是利瑪竇為建安王所寫，但當時在文人中廣為流傳。
《葡漢辭典》	萬曆十二年(1584)至十六年(1589)，利瑪竇在勤讀漢語過程中為了正確掌握漢字語音、貫通中西文字的字義，與羅明堅在肇慶合編了一本《葡漢辭典》，取書名為“平常問答詞義”。這是第一部中西文字典，它首創用拉丁字母注漢字語音，為漢字拼音開闢了新路。利瑪竇勤學漢語，為其後來把中國的《四書》譯成拉丁文介紹給西方國家打下了良好的漢語基礎。
《西國記法》	萬曆二十三年(1595)江西巡撫陸萬垓同意利瑪竇在南昌定居，請利瑪竇將記憶的方法用中文寫出，故利瑪竇便撰寫了《西國記法》一書。他把歐洲的思維科學和中國的文字學巧妙結合，以標準文言文表達之，填補了中國學術領域的一項空白。該書被稱為“西洋傳入之第一部心理學書”。
《畸人十篇》	吏部尚書李戴是河南人，年事已高，1602年經常邀請利瑪竇去他府中，談論來世的畏懼和希望的事情。幾年之後，利瑪竇把他二人的談話寫成一個提要，作為他一部書中的兩章。他後來添加了他與馮琦、徐光啟、曹于汴、李之藻、吳中明、龔錫爵、郭敦華等文人學士談論人生觀價值觀等問題的資料及其評論輯成此書，1608年初刻於北京。
《四元行論》	利瑪竇很少管或根本不管中國人對古代權威的信仰。他告訴他們，祇有四種元素，不多不少，它們具有相反的特性；他還告訴他們每種元素到哪裡去找，他們並不反對其它較低級的三種元素，但是他們很難相信天空之下發現的火要佔有基本土地的一大部分，他們不認為彗星和流星也燃燒着他們在地上所看到的那種同樣的火，他們把彗星也算作普通的星。利瑪竇用中文寫了一篇有關這個题目的評論〈四元行論〉，文中他拋棄了他們五種原素的說法，確立了四種元素，規定它們的位置並以圖加以表明。這個評論引起人們很大興趣。他們把它印了許多份，也像他的其它著作一樣到處獲得很高的稱贊。
《幾何原本》	利瑪竇定居北京時，徐光啟也在京供職。徐光啟對《幾何原本》十分有興趣，決定翻譯此書，從1605年9月開始，他每天前往利瑪竇住所，由利瑪竇口譯，他作筆錄，歷時數月，輾轉反複，精研細討，力求準確，前後三易其稿，終於在1607年初春譯成前六卷。1608年刻版竣工付印，即由利瑪竇寄多冊到羅馬給耶穌總會會長並分贈給自己的恩師克拉委奧(丁氏)。該書所顯現的西方公理化數學體系的思想、方法與特點震驚了一代世人，為正處黯淡時期的中國數學注入了生機。《幾何原本》一書，有助於使中國人學會用三角學和幾何學方法解釋天體運動，實現中國天文學發展史上的重大突破。
《天主實錄》	1584年，利瑪竇和他的秀才老師兩人用五個多月時間合編了一本漢譯教理書《天主實錄》。該書是羅明堅在澳門時將羅馬公學的一部神學教科書《要理問答》譯為中文，題作“聖教實錄”，因漢譯不確切而沒有出版。這次帶來肇慶由利瑪竇重新審譯，改名“天主實錄”。這是中國天主教第一本教理書籍，於1584年11月29日脫稿付印。利瑪竇將它送給各級官員和智識階層，通過他們傳到全國各地。萬曆十四年(1596)利瑪竇再將該書改成《天主實義》，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刻印發行。後來這本書通過各國貢使流傳到東南亞各國。

《乾坤體義》	1607年利瑪竇與李之藻譯編，全書分三卷，上卷論天球渾象，中卷論地球與日月關係，下卷論天體圓週運行。
《渾蓋通憲圖說》	利瑪竇與李之藻合譯，採用圖說方式介紹星盤的構造、原理、使用方法及意義。全書共兩卷，卷首另附一篇渾象介紹，並第一次介紹黃道坐標系。利瑪竇曾把此書寄給羅馬耶穌會會長和他的老師克拉委奧。
《同文算指》	利瑪竇與李之藻合譯，主要根據利瑪竇的老師克拉委奧的《實用算術概論》（1585年出版）和程大位的《算法統宗》（1592年出版）翻譯。這是中國第一部介紹歐洲筆算、級數和比例問題的著作，對後來中國算術的發展有巨大影響。
《同文算指通編》	利瑪竇談到西方的力學、物質比重的測定和計算、阿基米德原理及杠杆平衡等問題，引入西方比例演算法，使中國傳統的計算法與西方演算法結合起來，將中國數學在杠杆力學的計算上達到更高水準。
《圓容較義》	利瑪竇與李之藻合譯，是一部比較圖形關係的幾何學著作，包括多邊形之間、多邊形與圓之間、錐體與棱柱體之間、正多面體之間、渾圓與正多面體之間的關係。
《測量法義》	由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受，是一部關於陸地測量方面的數學著作。從內容上看，該書沒有超出我國古代勾股測量的範圍，不同的是將幾何原理應用到測量學上，每一個結論都用《幾何原本》的定理加以註釋。此書是幾何學廣泛運用於建築事業和水利工程的典範著作。
《二十五言》	萬曆二十七年(1599)利瑪竇在南京編譯的論理箴言集，內收二十五則短論，強調“禁欲和德行的高貴”，屬於《孟子》所指的“善言”，萬曆三十二年(1604)由馮應京出資刊印。
《西琴曲意》	萬曆二十九年(1601)，龐迪我入宮教西洋樂器演奏法，利瑪竇利用這個機會編寫了八支樂曲的歌詞，他稱之為“西琴之歌”（即《西琴曲意》八章）。這些歌曲都涉及倫理題材、教導良好道德品行的抒情詩，引用了基督教作家的話加以妥善的說明。這些歌曲非常受人歡迎，許多文人學士都要求神父送給他們歌曲的抄本，並高度贊揚歌中所教導的內容。他們說，這些歌提醒皇帝應該以歌曲中所提到的品德來治理國家。為了滿足對歌曲抄本的需要，神父們把它們連同其它一些曲子用歐洲文字和漢字印刷成一本歌曲集。
《利瑪竇中國劄記》	《利瑪竇中國劄記》是利瑪竇在1608年，根據自己的記憶，以他的母語義大利語撰寫的《天主教傳入中國史》，該書的中譯本為《利瑪竇中國劄記》。利瑪竇的著作（包括譯著）有十九種，內容涵蓋哲學、科學、宗教、倫理等，為他奠定“歐洲漢學之父”地位的就是他的這本回憶錄及其書信集。
《西字奇蹟》	一卷，利瑪竇用拉丁文拼寫漢字的著作，明萬曆三十三年(1606)初刊行於北京。
《理法器撮要》	共三卷。一，理卷，論述宇宙結構；二，法卷，簡介測量天體運行的幾何學方法；三，器卷，分述測天儀器的形象和用途。它是介紹歐洲宇宙論和天體測量方法的一部提要性著作。
《辯學遺牘》	內收吏部官員虞淳熙論佛的書信，以及反駁杭州蓮池祿宏和尚《竹窗三筆》攻天主教之說；收入明崇禎二年(1629)李之藻自費刊行的《天學初函》。